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卡娃伊革命”是怎样炼成的

和阅读有关的日子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生死尘梦一书求

连雅堂与青山青史

波士顿情书之六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中国式经济增长背后的代价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

千山我独行

给我写封
情书吧

给我写一封
情书吧，
我的爱人！

无需等到
疏雨打芭蕉、
残月照秋菊、
人醉黄花地的时刻，

动笔吧，我的爱人
就在今天天真的梦里，

拿起桌脚那支残损的
明黄圆珠笔，

动笔吧，我的爱人，
和我一起动笔吧，

罗
四
鸽

用如锥的紫毫，
将那首精雕细琢的虞美人，
用鲜润的清墨
刻在桃红的薛涛笺上，
鱼传雁递而来。

用断裂的字句，
将我需要的思念
写在不羁的奔跑中
遗忘在醒来的黑夜，

让我们彼此
为对方写一封久违的
情书

波
士
顿
情
书

给我写一封情书吧，我的爱人，
在沉寂如冰凉湖底的时刻
用你如草的乖张字体
在空空的烟盒
或是折角的迪金森诗集的扉页上

然后

让我们互相慰藉互相思念

在天各一方的
角落

彼此为对方守护一份
逝去

的古典爱情。

告诉我你那
没心没肺的日子
捉襟见肘的夏日
手指的方向
不甘寂寞的孤独
以及你我之间的
距离

把沉默当做我们
永久的誓言。

情书请发至 luciding@gmail.com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驥 灵子

轮值编辑

言一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严飞(美国·旧金山)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
扬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舞(北京)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1年12月 第5卷第11期

总第51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临近年末，哈维尔和金正日的同步离去，除了为2012的如约而至更添几分末世感之外，更是激起了这个古老大陆民众对于“德先生”的再度热议。有趣的在于，讨论中的部分锋芒正正指向了大写的“民众”。

年末亦是诸多榜单盘点发布之时。只是粗粗看去，大多盘点皆执于外物，事件，却独独少见对于自身与内心的清算，少见有人追问：世间的纷繁或是多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究竟有何助益？

盘点或清算，是对于过往的再认知与再发现。唯有基于这样一种对于过往的再认知，或是批判与反思，我们才可能瞥见那哪怕是末世的未来。这既是高华先生著作的价值所在，也是阅读之必要。

春节来临之际，谨祝各位《独立阅读》的读者：

龙年吉祥！



目录

封面用图

Composition

Piet Cornelies Mondrian

目录用图

蒙德里安系列

刘野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影像 • 言一

001-016

随笔

- 刘柠
“卡娃伊革命”是怎样炼成的
- 王晓渔
和阅读有关的日子

017-022

书评

- 孙传钊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 张无极
生死尘梦一书求
- 贾葭
连雅堂与青山青史

023-041

游记

- 罗四鸪
波士顿情书之六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042-054

访谈

- 孙骁驥
中国式经济增长背后的代价

055-059

逝者

- 崔卫平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
- 熊景明
千山我独行

060-069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最近网上突然有朋友问，为何近期阅读报告没有介绍佛教相关书籍，这一问，“激荡”起某些我一直在思考的想法，于是顺便在这里略作交代，或可供有兴趣的读者们参考。

这些年阅读传统思想渐多，感觉坊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大多为隔靴搔痒之作，抛开文字训诂学不谈，以思想、精神而论，今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很难相信古人拥有某些现代人所不及的智慧，古人的思想被学者们以各种“新奇怪论”解剖分割，得出种种“怪论”，在这样的割裂下，中国思想非没有任何价值，且只沦为列文森所言的“博物馆式的赏玩”而已。于我而言，自然并不相信这样的思路，在2008、2009年间，我在波士顿向一直研读史华慈思想的林同奇先生有过数次请教，并多次在电话里交流，让我大为受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借助史华慈得以理解中国思想中的“宗教”面向。由此，我才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今人不大理解的复杂面，回过头看，当代学者们提及此点的寥寥无几，史华慈先生算是一位，而华裔的秦家懿先生也当然算一位。

秦家懿，虽然在美加学界大有名气，但国内研究中国哲学者，却少有引介其研究，最近出版的《王阳明》（三联书店，



2011年12月)不过是她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而已，她去世前的名著《朱熹的宗教思想》(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年)虽在前几期阅读报告中提及，却未见国内任何其他反响，可见今日学界眼光之“迷离”，才会有此遗珠之憾。

简略而言，秦家懿的研究最让人感觉启发的是，就是她充分注意到传统儒家，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思想中的“宗教”面向，当然用秦先生的表述，就是“笔者一向认为，中国性理学思想，与西方宗教思想，尤其是本于所谓‘神秘经验’的思想，有接近处”。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宗教面向”能归入西方

的“神秘主义范畴”，但显而易见的是，儒家、佛家及道家都包含了强烈的“反常识”的宗教面向，要获得这方面的了解，不能简单从知见上获取，而是要另觅他途，例如宋明儒家常用的“静坐法”。当然这又涉及到儒家与佛道二家的交涉问题，此处不能赘述，但观《王阳明》全书大要，秦家懿先生均会以“良知”的宗教面向去统摄，其解释力度显然要强于坊间其他论阳明学之著作，更为让人信服。

秦先生的“空谷之音”并非偶然，最近恰好读憨山德清的《道德经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读到这样一段有趣的话：

予少喜读老庄，苦不解义，惟所领会处，想见其精神命脉，故略得离言之旨。及搜诸家注释，则多以己意为文，若与之角，则义愈晦。及熟玩庄语，则于老恍有得焉。因谓注乃人人之老庄，非老庄之老庄也。

憨山德清是晚明时人，连他都痛感古人“解老庄”之不知所云，何况今人？

临近岁末，未见多少思想类的新书出版，这个时代本已稀少的思想者们却一个个接踵而去。从身份上看，刚刚去世的哈维尔是剧作家，高华是党史学者，但他们却都拥有这个时代相当稀缺的思想品质，即“真实地面对世界与自己”。姑且不论大家所熟知的哈维尔对后极权谎言世界的揭示，就连高华这位党史学者而言，在我看

来，其工作的意义也绝非仅仅只在历史学层面，因为他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对者，也不能被归为寻章摘句的专业工匠，他更像是一个试图从心灵层面摆脱意识形态禁锢的“真实的人”。

一旦追究“真实”问题，势必会涉及到“真理”的诘问。阿伦特是少见的认真对待“真理与政治”问题的现代政治哲学家，在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 张立立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0月）中，有一篇专门探讨“真理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她如此问道：

谎言从来就被认为不仅是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必要、合法工具，而且也是政客交易的工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对政治领域的本质和尊严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对真理和诚实的本质和尊严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理的本质就是无能，而权力的本质就是欺骗吗？

假如谎言是政治领域的逻辑，那么美德、真理问题势必很难介入政治的运作，按照阿伦特的看法，无论是“事实真理”还是“理性真理”，都会与政治发生冲突，但她显然认为，“真理”不能直接介入政治，政治领域有其特殊的逻辑所在，即它必须容纳各种不同的自由“意见”，公开地就政治原则进行讨论。但是政治却不能脱离“真理”的土壤，沦为“谎言”的跑马地，阿伦特将事实真理比喻为“脚下的土地”，

将“理性真理”比喻为“头上的苍穹”，尽管并不存在唯一、绝对的真理，但是现代社会将真理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与“意见”之争，也使得政治逐渐脱离真理的约束，逐渐沦落为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阿伦特显然认为，政治的价值则应处于这二者之间，不能被真理逻辑僭越，但又无法告别真理。

这种政治哲学的讨论，虽然有思辨上的价值与意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此其实兴趣了了，或许更想借由历史或人类学的引介直接进入“政治的现场”。最近出的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自传《追寻事实》（林经纬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里面记录了格氏当年在摩洛哥与印度尼西亚作人类学调查时的过程，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格尔兹对1965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描述，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对这场风暴过后的人类学式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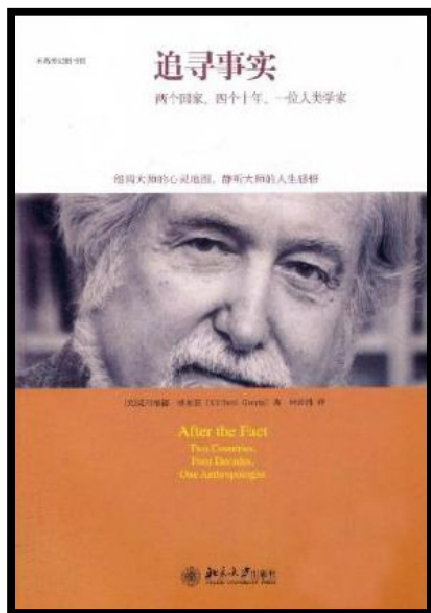
“巨大的震荡过后，往往就是汲汲营营地过活，这会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事情终于步入正轨的感受，对于我这样一个见证了事情的序幕和终曲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因为完整地经历了这一切，而有理由另作他想。一个人在讲故事时，很自然地会有开始、中间和结尾之分。”

仔细玩味这段话，其实颇能与当下中国的某些感受结合起来，78年改革开放难

道不是我们剧本的某个“开端”吗？认为一段旧历史已经过去，新局面即将延续、稳定下去，而短短三十年，这个“新开端”的剧本就显现出跌宕、倒退的剧情，与众人的希望大相径庭。历史，不就是如此的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吗？

最后，顺便介绍一本音乐方面的书吧，《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高中甫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关于马勒，他的音乐曾是我青春期时的“巨大阴影”，到后来逐渐地接受与理解，这当中见证了个人精神成长的过程。如今去听马勒，已经不大会有“高山仰止”的感受，反倒有时会无端生出某种莫名的“同情”了。

或许，对精神与意义太过执着之人，彼此都会以同情的眼光来对视吧。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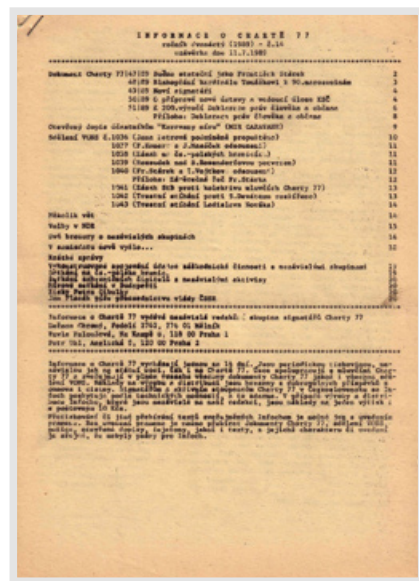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2011年岁末，韩寒的三篇博客引发激烈争议。在《说民主》里，他这样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文人的领袖”指刚刚去世的哈维尔，这位荒诞派剧作家是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曾经因为坚持良心数度入狱，后来成为捷克首任民选总统。

韩寒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出现，原因之一是民众有素质。或许，他没有读过哈维尔的文章。在哈维尔笔下，当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素质并不比今天某些国家更好：“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但是，哈维尔没有因此断言天鹅绒革命绝无可能，他知道人们的阳奉阴违是“被迫”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曾向波兰朋友米奇尼克回忆，每当有外国记者



对他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他经常回答：“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

1940年，正是纳粹的盛世。作家E·B·怀特在纽约听到一些高见，有人说纳粹的理想比美国的宪政制度更妥善，因为新闻短片中德国年轻士兵的面孔充满活力，而美国的年轻人却整天泡在电影院里。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另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却在电影院纸醉金迷。德国的民众素质似乎远远优于美国，德国的制度似乎也远远优于美国。但

当时的怀特专门撰写文章《自由》，重申了相信自由的立场，并且提醒读者思索这么一个事实：“这片土地仍然欢迎公民写剧本，写书，绘画，集会讨论，表达异议或赞同，站在肥皂箱上作街头言说，接受没有审查制度的各门学科教育，组成陪审团相互裁断，谱写乐曲，与邻居谈论政治而不必担心有秘密警察打探，交流货物也交流思想，嘲笑政府如果它果真可笑，阅读关于真实事件的真实消息而不是国家付钱给人编造假新闻。”

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泡在电影院里的美国年轻人到了战场，他们的表现一点也不比德国同龄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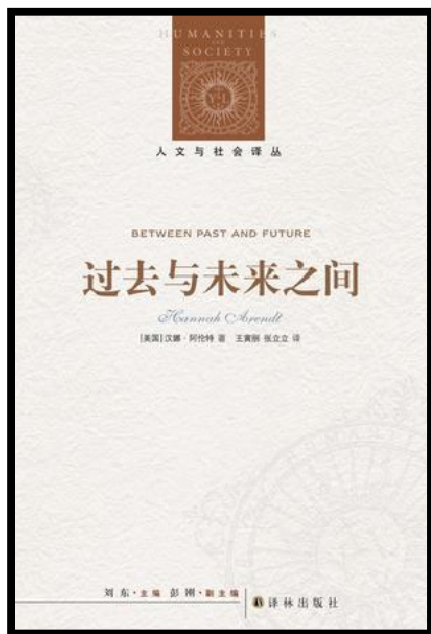
怀特的随笔集《人各有异》（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1月）收入了《自由》，虽然距离初版已经过去七十年，现在读来依然亲切。读过这本书，才会真切地理解为什么怀特能够写出《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精灵鼠小弟》等一系列经典之作，因为他近乎天真地坚守着自由的价值，拒绝成熟名义下的世故。所谓“自由”，如怀特所说，不仅是“作为动物居住在一个星球上体验的本能自由”，更是“作为人类社会中拥有基本权利的成员享受的实际自由。”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你未必要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因为你可以拥有思想自由，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或个人可以对你的思

想自由加以限制。这种观点似乎很雄辩，却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思想只能在交流和对话中才能展开，也只能在公共空间中显现出它的价值。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立、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0月）里指出：“一个人如果不是首先经历过作为一种世间有形实在的自由状况，他就根本不知道内在自由。”阿伦特的著作，读起来不太轻松，但总是值得阅读。

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阳奉阴违和德国年轻人的雄赳赳、气昂昂，都指向一个事实，即民众缺乏自由。只有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民众才会表现得如此整齐划一，集体犬儒或集体崇高。集体犬儒是自我保护，因为善意无从得到表达，不会被鼓励，只会被



惩罚。集体崇高是一种幻象，德国士兵的青春面孔之下隐藏着种族屠杀的残酷事实，那是比集体犬儒还要可怕的道德崩溃。

一个正常的制度，应该允许民众保持素质的差异，年轻人可以泡在电影院里，也可以站在肥皂箱上作街头演说，两者并不矛盾。所以，在讨论制度转型时，需要告别两种心理：一个是期待民众素质好了再进行制度转型，一个是期待制度转型之后“人皆为尧舜”——这两种心理都通往“改造思想”的逻辑。

刚刚去世的高华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讲到，早在“五四”之前，梁启超、鲁迅等知识分子就觉得中国的国民性存在严重问题，应当“改造国民性”，从“改造国民性”到“改造思想”，过渡并不困难。（《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高华先生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中，讲到《鲁迅全集》等作品在文革期间支撑起他人文主义的信念。但是，他面对历史时保持着学者的冷静，对从“改造国民性”到“改造思想”之

路有着深刻的反思。他的著作很难见诸读者，《高华历史笔记》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分地弥补了这个不足。

亲身经历过“整风运动”的灰娃先生，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我额头青枝绿叶》（天行健出版社，2011年10月），比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更加完整。承蒙作者惠赠，有幸拜读全本。这本书的内容，此前的“独立阅读”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书中讲到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个发生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两个排队购买食物的男人，因为谁先谁后，大打出手，头破血流；另一个细节发生在1989年，两个男人骑车相撞，正要相互指责，忽然意识到他们都准备去广场，于是扬手致意。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或许就是哈维尔所说：“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批评这个社会没有灵魂，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如何唤醒这个社会的灵魂？**Q**

观察员 言一（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原本只是循着自身重口味而去的一场猎奇，不料却成就了个人年末的一道盛宴。除了向英剧《黑镜》(<Black Mirror>)的编剧和导演致以最为真挚的敬意这一简单直接的方式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更为贴切地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越。

有趣的是，一位在美利坚念传播学的好友，她的期末论文之一叫做“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y”（姑且译为：科技的意外吧）。在她下笔之前，我们曾经聊过一阵究竟什么叫“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今看来，《黑镜》几乎就是对这一论文题目的绝佳注解。

Ep 1.

在更早之前，我们亦曾聊起过BBC的纪录片<How Facebook Changed The World: The Arab Spring>。无可否认，sns网站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但仅是这样却并不足以佐证其正当性/正义性。正如《社交网络》中马克扎克伯格所阐述的那样：他现在所做的，不过是让其成长，而其究竟会成长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确



定；另一方面，sns网站高企的市值亦并不足证其价值，而只是更多地凸显了投资人的预期而已。

同作为sns的典范网站，YouTube和Twitter在《黑镜》ep1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远非那么正面。在片中，YouTube和Twitter上的各种回复成为了网络时代的“民意”，首相大人的一举一动也不得不随“民意”的趋势而变，以至于最后不得不走进地狱般的直播间。在这里，ep1并没有像其他B级电影一般去仔细呈现那个极具话题性的场面，而是把镜头缓慢地扫过了广大围观群众的脸，两遍。于是，我们先是看到了美梦成真般的激动和兴奋，然后看到的是噩梦悄然侵袭时的啜泣。

不知是谁说过：美梦成真的那一刻也可能是噩梦降临之时。我并不确定那些渐渐变得悲伤，扭曲的面容是意味着有什么内心的东西被唤醒，还是他们感到了某种东西的坠落；但至少，我们不难兔死狐悲地想到：首相且如此，民何以堪？安迪沃霍尔的名言也似乎可以被更精确地陈述为：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被直播的机会（no matter it is for or against your will）。

比起后面的ep2和ep3，闹剧般的ep1要短上那么15分钟，这使得它更像是谱曲时定下调性的第一个音符——媒介之暗面，而紧随其后的ep2和ep3不论其编织与铺陈有多么精巧绚丽，最终也都殊途同归

般回复到这一被黑色浸染的注脚。

Ep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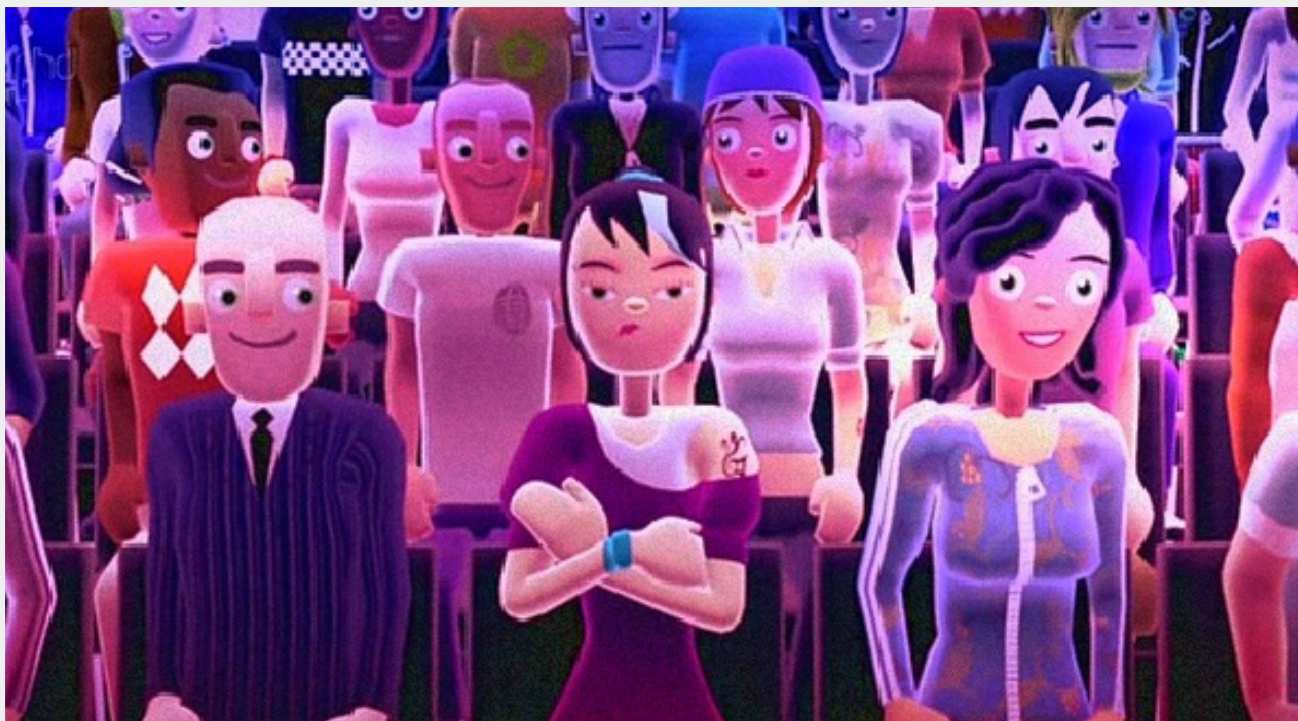
虽然《黑镜》之编剧的想象力毋庸置疑，可一切也非无本之木，凭空捏造而来。只是，与其说ep2中的虚拟世界与《机器人总动员》中人类飞船里的生活场景有几分相似，倒不如说编剧为我们呈现的更接近于一个彻底苹果化了的世界。我们的工作，娱乐，乃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通过一个个高度发达的app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眼下正在做的——动动手指，挥挥手臂而已。似乎是嫌这样的类比还不够明显，提供该视觉平台的公司还被命名为noppie(no-apple?)，其间想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

比起noppie这样的影射，对于选秀的嫁接更是一头撞入我们当下的生活。不论是在我们的现实中，还是ep2的世界中，选秀都已经成为了从一文不名走向一鸣惊人的康庄大道。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去问：选秀的背后，究竟是谁在做出选择？是评委，还是大众？鉴于几乎所有的选秀到最后都号称把决定权交给了大众，那么究竟谁是大众？在有了ep1的前车之鉴之后，参加选秀这一行为本身是否也意味着自身权利的一种让渡呢？又一次，个人意愿需要在媒介的舞台之上直面(confront)大众的意志；或者说，与ep1一样，大众又一次站到了某种个体的对立面上。

在这样的一种近乎于对峙的关系当中，评委的角色十分值得玩味。他们宣称自己只提供意见，并不拥有作决断的权力。然而，评委之所以为评委，则是因为他们了解大众，知道如何取悦或操控大众；所谓的点评，也不过是告诉你该如何包装和贩售自己(的某个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像极了齐泽克口中的电影(参见《变态者电影指南》)：唤醒大众的欲望，把玩大众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控制在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内——当评委的这一行为特质被放大到极致时，我们才得以看到在《黑镜》ep2中的生杀予夺——讽刺的在于，这一权利亦正是源于剧中那些以复数方式+虚拟形象所呈现的大众。

面对着评委的强势与物质(哪怕只是虚拟的物质)的诱惑，选手的人生抉择早已由他们上场前被要求喝下的饮料名所暗示：compliance，妥协。带着满腔怒火，且未曾喝下规定饮料登台的男主角原本有机会在怒斥评委和选秀的虚伪后，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选秀给出一个大写的NO；然而，他所有的愤怒却被评委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给击碎了：刚才的那一切都是你的表演吧。

那一刻，我的嘴角浮起微笑，全身却汗毛倒竖。我仿佛看到一个隐形的，形状不明的怪兽借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将一个人类倾尽全力的攻势在顷刻间瓦解，吞噬。那一刻，我看到台上那双迷茫的眼睛，我知道：消费主义又一次赢得了胜利。是



啊，还有什么不能被表演的呢？随之而来的热烈鼓掌，也绝非是对个体的褒奖，而更像是对消费主义胜利的欢呼。这竟是怎样的一种皆大欢喜？

仅仅是影射与嫁接的简单并置，尚不足以成就ep2的暗黑气质。真正让ep2大放黑色光华的，还是在于虚拟视觉生活与选秀消费主义的无缝连接。换句话说，当人们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混吃等死的消费者或是渴望追寻不同于虚拟视觉的真实时，他们会发现：每一分自己找到的真实都会被消费主义吞食然后转化成虚拟的视觉予以呈现，人们无法成为一名真实的生产者，而只能沦落为虚拟的被消费的生产者。就仿佛除了自杀，来对这个世界说“不”之外，人们其实无路可逃。这一宛若幽闭空间中一步步感受黑暗侵袭时的窒息感，其表面却又是那样的光鲜靓丽，五彩缤纷。

Ep 3.

老实说，ep3的开头让我很有些懵懂。圆桌评估中的洽谈，让我瞬间想起了豆瓣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以及前些日子里“身为人母”的热点讨论：片中，一家未来的公司打算接下来开拓的经营领域正是针对父母亲的追溯性起诉，比如起诉他们对自己关爱不够而导致自己现在自信的缺乏和收入的低微。很难想象这样的业务如果真的在现实中开展会是怎样的情景。只是，这样一个简短而有些突兀的开头已经

为所有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没有任何相机能完美地复制并呈现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扔掉相机的理由。可我从来都未曾反问过自己：如果有一天完美复制，储存和呈现(播放、定格、放大)我们眼见的一切——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我们所有的记忆——成为日常，我们的生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似乎正是ep3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如同ep2一般，ep3中这些颇具科幻意味的设定并非前无古人。早在西班牙的独立小制作<Sleep Dealer>中，日常生活的记忆便可以放入网络被当作日记贩售；而ep3中几乎人手一枚的U盘大小的电子装置则让人联想起好莱坞喜剧《人生遥控器》。只是，当这种设定的联合被放大普及至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时，我们也就开始遭遇那些“unintended consequences”。

通过植入这种被称为“grain”的电子装置，你能在任何时候回放你的任何一段经历，定格和放大每一帧画面，重温任何一段经历，只要你未曾将它删除；你甚至还能将这一记忆的视觉影像投影到任何一个屏幕上与周围的人分享——这样一种分享的便利程度，我想，正是现实中不少sns(微博)用户所渴望的，不是么？

然而，这样的便利却是以对(姑且称为)影像权的悄然篡夺或是对于镜头敏感的直

接漠视为前提的。就仿佛是约定俗成一般：每个人都认可自身成为他人影像的采集对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对于记忆的采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固然使得任何人都有机会过上一把<Lie to Me>的瘾，或是切身体验一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侦探剧，而<Lie to Me>也早已向我们呈现了真相的杀伤力。

已经不难看到：不论是该公司打算开设的新业务，还是日常记忆采集的设定，几乎都在结果上指向了对家庭的拆解。这样的拆解究竟会铸就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固然难以确定，但流动性的增强和人与人之间疏离度的增加却是大势所趋。又或者，当日常记忆的采集和分享成为sns的终极版

本，我们是否不得不回到最初那个有趣的问题：sns的出现究竟是让人们的联系更紧密，抑或更疏离？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都难以忘掉《社交网络》中，扎克伯格在向前女友发送了朋友的请求后，不断刷新页面的镜头。

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从记忆本身出发，来观照上述的提问。在剧中聚餐的餐桌上，一名从事植入“grain”的女士宣扬了植入“grain”的理由：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忆采集装置，那么我们的记忆是很容易被那些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比如催眠师，所篡改的；又或者，记忆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变得模糊。有了这样的装置，任何的记忆都将变得可查证，可核对。



这段专业的陈述，事实上关乎于对于记忆的定义。究竟什么是记忆？记忆能否等同于或者一定是真相？就我个人而言，作为普鲁斯特和本雅明的信徒，我几乎是本能地抗拒这样一种单一化的记忆。它意味着我们复归过去的路径只有一条，我们和过往的联系也将仅存一种。我们将无法去享受记忆的多义与游览其间的层峦叠嶂，无法在各个吉光片羽般的记忆片段前眼花缭乱，如坠梦幻。当我们将多义的记忆阉割到只剩真实，那么我们也需要去面对那些撤下了自我防御机制后的现实的创伤。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强大到足以面对这些创伤，尤其是一次性地去面对它们。

Ep3叫做“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你个人的全部生命史。对我来说，这更多地是一个问句：你准备好面对/检视自己的全部历史，所有回忆了么？

尾声

尽管《黑镜》在情节的设定上颇具科幻意味，但其内核却完全指涉现实。从ep1到ep3，编剧似乎更像是醉心于某种学术研究：先是提出假设，然后推导论证。并且，他选择的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式，试图通过某种放大到极致或是极度偏执的假设，来获得对于人性，对于生活的洞见。因此，我更愿意从所谓“hyper-real”或者德勒兹意义上virtual去理解这样的设定，而不会去考虑设定本身的现实性和逻辑性。也即，剧中所有的设定都具有一种“潜在的现实性”，或者说是现实与虚拟的耦合；而这一耦合所形成的多义文本空间，亦正是该剧之魅力所在。

此外，上面所有的解读几乎都只集中于“黑”，或者说“暗”；关于“镜”(mirror)的解读可以说还未开始。个人初步的设想中，除了需要参考各家关于镜像的理论论述之外，“视觉化”也将是解读的重点之一——剧中所有技术设定几乎都以视觉化的媒介为载体，那么当我们，比如观看我们的记忆时，我们究竟在看什么？当我们将自己的记忆快进，定格，放大的时候，我们在手中把玩的又是什么？又或者，是否在有了对于记忆的视觉储存和播放的便利之后，我们便可以永远地活在记忆当中呢？

“卡娃伊革命”是怎样炼成的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一个精灵，一个叫做卡娃伊的精灵，在世界徘徊。”模仿《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启示录口吻并非为了假充先知，而是因为确实感知到了这种精灵般的存在。若论及近二十年来，持续萧条的日本对世界做出了哪些贡献的话，当首推卡娃伊文化的输出。今年夏天，国际顶尖的时尚百年老店施华洛世奇（Swarovski）公司在全日本最酷的步行街东京表参道公开展示了9组由世界著名艺术家设计的Hello Kitty造型的雕塑。11天的展示结束后，所有展品义拍，全部收益捐献给东日本大地震的灾民。展示和拍卖活动盛况空前，形形色色晶莹剔透的Hello Kitty造型的纪念品、小物件铺天盖地。这位被日本政府外务省任命的“动漫大使”、卡娃伊文化的“女王”，可谓风头出尽，赚足了闪光灯。

Hello Kitty是卡娃伊文化的Logo和名片，但并不等于卡娃伊文化本身。

“卡娃伊”是日文“Kawaii”的音读，可用汉字写作“可爱”，但日文中的语境则比汉语的“可爱”要复杂、微妙得多。

《广辞苑》的解释是：1、令人怜悯的，可怜的；2、值得去爱的，令人感到很深的感情的；3、小而美的。语感大致相当于中文口语的“可怜见儿的”、“小可怜”



或书面语的“楚楚可怜”、“楚楚动人”。这个词的英文，一般翻译成“Cute”或“Pretty”。但研究日本电影的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则认为，翻译成“Neat”或“Cool”才更贴切。总之，“Kawaii”是

图为Hello Kitty

一个高度抽象且内涵深广的语汇，其词根甚至源自11世纪古典名著《枕草子》中的古语表达，意境幽深，殊难传达。于是，像历史上类似的案例一样，“拿来主义”成了最便捷，却也是最现实、最差强人意的选择：新版《新牛津美语辞典》（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中，已经收录了“Kawaii”的词条；同时，这个词还直接进入了法语、意大利语、俄语和韩语；而用中文“卡娃伊”做标题，甚至做封面报道的时尚系刊物，已经碰鼻子碰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源自日本的卡娃伊文化，已然成功“越境”，并开始包括中文在内的异文化土壤中生根。

“一看镜子，哎呀，我的脸令人意外地鲜活生动。这张脸，是别人的吧。它和我悲伤、痛苦的心境全然无关，似乎自由存活在另一个个体中。今天我并没有抹腮红，却双颊泛红，樱唇鲜艳欲滴，好可爱。摘下眼镜，嫣然一笑。我的眼睛好美啊，澄澈透明。或许只有长久注视傍晚美丽的天空，才会有这么美的眼睛吧。太棒了！”作家太宰治在发表于1939年的短篇小说《女学生》中，把一位在东京御茶之水附近的女子高中读书的、新近失怙的小女生顾影自怜的“卡娃伊”神态描绘得颇传神。

在日本，如果一位男士当面称赞坐在对面的女性“美丽”的话，对方恐怕会笑出声来，至少不会当真。如果男士说“你很卡娃伊”的话，那位女士便会把他的话当成发自内心的赞美，欣然接受。日

本文化学者、《论可爱》一书的作者四方田犬彦认为，构成“卡娃伊”的三种要素是：幼小、怀旧、孩子气。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雏祭的各种器具。从池里拿出极小的荷叶。小小的葵叶，也很可爱。凡是细小的东西，都很可爱。”韩国比较文化学者李御宁也深入研究过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可以说，对小物件的眷恋、以小和精致为美，是日本传统美意识的根基。而“怀旧与微缩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好伙伴”，用美国后现代思想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话说，怀旧是“后资本主义文化的中枢”。从古董热到仿古纪念品，到中产阶级邻家女孩闺房里的家族像册，无不传承着这种人造的“古风”。从异文化的视域出发，感到最“隔”的要素，是孩子气——它要求对东洋文化中的“未熟”之美有一定的启蒙。卡娃伊漫画圣典《美少女战士》的主人公月野兔，是“一个有点小失败、爱哭鼻子的普通女孩”，因偶然搭救了一只神秘的猫，而变成了月亮的化身，被赋予了从邪恶势力的手中拯救地球的超能力。月野兔面对强敌，骁勇善战，越斗越狠，在终因体力不支倒下时，却被美少年小卫轻轻一吻而重获生命能量，从而收获大团圆结局，皆大欢喜。如此，幼小、怀旧、孩子气——“三位一体”的卡娃伊美学，构筑并消费着虚拟的神话世界，制造着一个又一个通体散发着神性灵光的、性感而又脱离肉欲的少男少女偶像。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却深谙人间的喜怒哀乐；他们爱憎分明，却没有撕心裂腑的大悲大喜；他们是一群

小可爱、小清新、小可怜、小悲伤。

卡娃伊文化深深植根于与日本的美学传统中。以古希腊美学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崇尚永恒、对称、壮阔、成熟之美。而与之相对，东洋美学则一方面受制于自然环境，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以非永恒、非对称、谦逊、未熟为美，结果酿成了迥然不同于泰西的审美气质与标准。乍看起来，卡娃伊文化似乎与日本代表性的美学观念、诸如“佗”（Wabi）、“寂”（Sabi）、“粹”（Iki）等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因为被认为“卡娃伊”的物事，必须是熠熠生辉的、鲜艳夺目的、造型夸张的。但细加考察的话，譬如Hello Kitty的造型，眼睛很大，嘴巴很小（或干脆没有，被认为是“未熟”的特征），有些细部则干脆付诸阙如，其面部特征极其简素化，纤弱的身体上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有种弱不禁风、摇摇欲倒的小可怜见的感觉，本质上仍不脱东洋的美意识传统。

日本自古至今，是男权社会。调节、缓解等级社会的权力金字塔所造成的普遍压抑感的，是被称为“和”（Yamato）的文化，而Hello Kitty正是这种文化下生成的尤物。基于“和”的理念，象征着权威的组织化系统，试图对公众社会呈现“卡娃伊”的一面，以改善权力构造的铁板一块的固有形象，从而使社会的表情多元化。如“京王线”电车的车门上贴着五颜六色的Hello Kitty图案的标签，旁边则写着“请勿触手”、“危险呀”、“要远离车门



哟”等注意事项，以某种亲切的、近乎女性化的柔软形式，达到公关的目的，却避免了男性化的呆板说教色彩。

早在19世纪末，随着日本的开国，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和瓷与西方艺术发生碰撞，对印象派艺术家等产生了相当的辐射效应，在艺术史上被称为“日本主义”（Japonisme）。然而，彼时的“辐射”毕竟仅局限于艺术界和一部分艺术家，是纯文化性的。而此番的“越境”者，则是以东洋动漫为载体的美少女战士、Hello Kitty等虚拟偶像，是次文化性的，它通过时尚改变人的生活，其受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甚至被称为“卡娃伊革命”。

是耶非耶，会结成何种成果，“革命”正当进行时，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我等权且围观之。Q

图为Wabi Sabi示意

和阅读有关的日子

特约撰稿人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这一年的生活，和往年没有区别，都和阅读有关，买书、读书、写书，无非是这样。

有的朋友已经不买书了，只在网上下载电子书。我固执地维持着去书店买书的习惯，每去一座城市，都不会放过当地的民营书店。

一月份在厦门的鼓浪屿，去了晓风书屋，此前去过杭州的晓风书屋，都很喜

欢，是想象中的样子。两地的晓风书屋没有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随后去了厦门大学附近的光合作用书房，谈不上喜欢，总感觉思想文化学术的氛围远远不够。或许书店要考虑生存问题，不得不如此，但光合作用依然没有逃过经济危机，数家分店在秋天停业。意外的是，厦门大学校园里面有一家人文书店，各种人文社科类书籍一应俱全。衡量一所大学的好



坏，不需要那么多数字和指标，只要逛逛校园内外的书店，就八九不离十了。

每次去北京，只要有可能，都会去万圣书园。看着那些密不透风的书架，感到温暖和亲切，又会心生绝望之感。或许不是绝望，是一种敬畏。今年去北京的次数比较频繁，有次住在八道湾附近，在新街口的中国书店发现1991年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叶利钦自传》。我在那本书的周边地带仔细搜寻了一遍，想寻找与它一起出版的《哈韦尔自传》和《瓦文萨自传》，未能如愿，只能继续读手中的复印本。20年过去了，这套书应该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上，永远坐着看书的读者。香港有个专有名词叫“打书钉”，指在书店只看书不买书。秋天去香港，在二楼书店附近订了酒店，醒来就去逛书店，累了就回酒店休息，颇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感觉。田园、开益、序言、榆林、乐文，这些名字像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书店是这座工商城市的隐者。

好几家书店的正中央放着一本标题触目惊心的新书《完全政变手册》，但是书店里的读者一个个温良恭俭让，并无发起政变的迹象。在二楼书店，内心总是发生冲突，买还是不买。考虑到回程，我每次总是浅尝辄止，不敢恋战。想想千里迢迢赶到香港，把内地学者的著作带回内地阅读，就觉得很荒诞。在书店看到免费赠阅的《读书好》月刊，有些惊喜，这份月刊由新鸿基地产集团资助，但是内容

与地产无关，都是围绕公共阅读而展开。无法看到纸本的朋友，可以访问网站：<http://www.books4you.com.hk/>。

对于书店，我自认见多识广。到了东京的神保町，我发现自己是夜郎之蛙。虽然此前对神保町已有耳闻，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出了地铁口，看到看不到尽头的书店，有的店家甚至从19世纪的明治时期开至今天，心中翻江倒海。后来上网查了一下，神保町是世界上最大旧书店聚集地，内心才算稍有平息。

在香港，书店开在二楼甚至七楼，是为了减少房租，降低成本。可是神保町的旧书店却是在沿街的黄金地段，由于一楼店面已经布满书店，也有一些被挤到楼上，有的从一楼到八楼，每层都是书店。于是，我直接乘电梯到八楼，一层一层逛下来。可惜时间有限，未能一家一家的“扫街”，所以离开神保町的时候，我就决定，如果下次再到东京，一定要在神保町附近住上一周。回到上海，立即买了一本《神保町书虫》，补做功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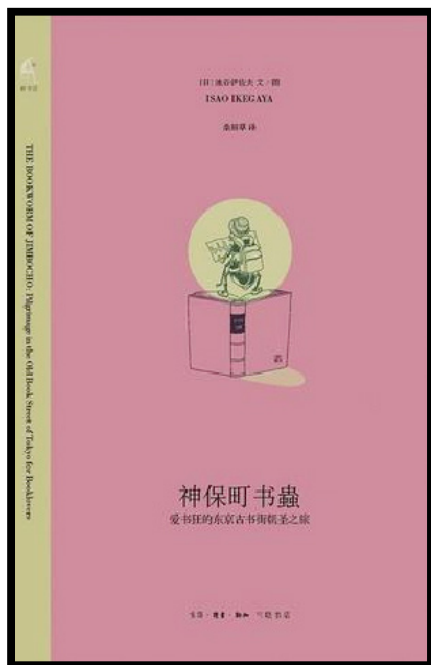
书店不仅可以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的标准，也能够衡量一个国家对文化的尊重程度。在东京，在京都，随处可见书店，似乎比肯德基的数量还要多。走进去看看，许多人文类的书籍放置于醒目位置。地铁里看书的乘客，随处可见。但和当地的朋友聊天，他们总是感慨世风日下，书店的数量和地铁里的读书人已经大幅度下降。

这一年，不仅在买书、读书、写书，也在尝试和朋友们一起推动公民阅读在

中国内地落地生根。上半年，参与了网易读书频道发起的公民阅读活动，与另外十一位评委，每月与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书目。下半年，在安徽教育出版社主编的“独立阅读”丛书出版，第一辑共有四本，分别从思想、文学、艺术、文史出发，讲述了各自的阅读和思考。

在一个公民社会比较成熟的地方，阅读未必是培养公民意识的第一选项，因为大量的公民行动可以参与实践，也有大量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思想讨论。但是在公民社会刚刚开始成长的地方，阅读就显得至关重要，独立思考的意识往往从阅读中产生。这一年，参加了很多关于阅读的活动，见到许多对公共生活充满热爱和思考的读者。年底，围绕民众的素质，微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人心惟危，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里所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

如何唤醒“沉睡的善意”，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要从阅读开始。Q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一. 大学人的饭碗

去年贝尔托·博比奥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中文版（陈高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问世了。博比奥这本书出版时，意大利国家政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时期——全国大选前夕，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坛正在发生巨变变化：意共势力日益衰微导致与意共曾多少结成过同盟的1940年代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老一辈主流左翼政治家，与他们生理的衰老一样，影响力也日趋低下。相反，意大利学界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政界极右翼的新纳粹主义政党兴盛起来。当时意大利左翼学人为此忧虑，把这种政治现状叫做“反法西斯者的危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1994年大选结果是中右的力量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组阁，与新纳粹

党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联合执政。博比奥在这本书中力图说明：在左翼政治势力走向衰弱的时代，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要划分左与右？划分左、右的标准是什么？“左”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博比奥本人在该书出版不久前（1992年）遭遇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年轻时参加“自由与正义”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运动，1935年26岁时，被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逮捕后给墨索里尼写的一封效忠信偶然被发现。博比奥出于恐惧，为了保住自己大学教师的饭碗，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自己将有坚定政治立场、拥有成熟的法西斯者的信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信的暴露，博比奥个人声誉大受损伤，他不仅是著名学者、上议院终身议员，而且更是因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在抵抗组织“自由与正义”基础上组成的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民心目中德高望重；更重要的

问题是，尽管80多岁高龄的博比奥事发后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失足作了沉痛、深刻反省（可以参见199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论老年》），他的名誉受损，给当时老一辈反法西斯战士正在政界影响力衰退势头雪上添霜。同属左翼阵营晚辈学者鲁扎托（Sergio Luzzatto）10多年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封令人讨厌的信件，26岁虽说年轻，但他也已经完全是成人了。尽管这是意大利历史暗处的一件小事，可也是不容争辩的证据。”（《反法西斯的危机》，日文版，《反ファシズムの危機》，岩波書店，1996年，71页）但是，鲁扎托还是为博比奥辩解：他之所以变节，

“不仅说明反法西斯者的软弱，更说明法西斯的残忍。……是乔凡尼·杰恩提尔（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著名新康德主义派哲学家、墨索里尼政权教育部长，直至1943年，还参与墨索里尼在德军庇护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暗杀——引用者）在四年前开了先例：杰恩提尔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集体向法西斯政权公开效忠宣誓，全意大利总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宣誓，这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追随权力的耻辱的证据，而今天却有人要对这位最终还为墨索里尼效力的哲学家（杰恩提尔）作重新评价。”鲁扎托还认为：博比奥为了保住大学教师职位，“只是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自由换取俸禄已经成为普遍的事情，并不是新鲜的证据”。（72-73页）鲁扎托的这一句辩词



并不算太勉强。因为历史上民主、和谐的社会中的大学教师有时也只能以知识换取俸禄。

凡依赛（Laurence R.Veysey）在叙述美国大学的变迁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 1965；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19、20世纪交替之前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涉及教员与学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不是教育理念、学术倾向等思想、信仰问题。即使在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环境中，也摆脱不了与职业稳定、地位、薪水等问题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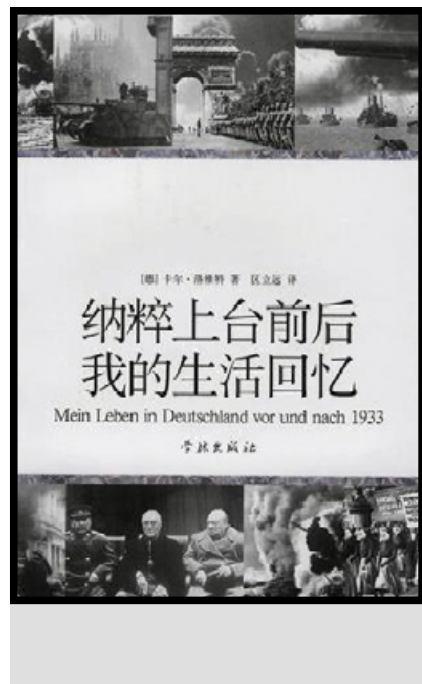
百年前美国私立大学虽然远离国家权力，但是董事会、管理层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杀手铜——威胁到大学教师所谓安全、地位、薪水，对于教师来说，说白了就是

一个保住饭碗问题、争取更好的饭碗问题。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场决定财源，私立大学金钱决定发言权，金权——投资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通过代理人校长实施行政化管理，即通过物质、人事资源管理制度调节、控制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教授对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凡依赛在书中援引当事人——大学教授亨利·塞德尔·坎比回忆：

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着一份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待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工作时感到安心，…… 1906年，卡内基基金会意识到了这种教职员担心的现实，当时它实施了一项全国性计划，在教授从现任职务退休时给他们提供养老金。虽然卡内基计划最初的形式仅维持了几年，它对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动也许是学术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获。

(p.479)

当年美国大学教授们都认识到束缚自己脑袋和手脚最大的威胁是丢饭碗，都要保住饭碗，也只有软弱地妥协。最具有代表性的斯坦福大学解雇罗斯的事件，因为老板斯坦福老太太个人认为罗斯过多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虽然当时大多数斯坦福大学教员对罗斯丢了饭碗表示同情，但是，“事实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教授们总有要吃饭的孩子），斯坦福的绝大多数教职员都认可了管理层的立场。”当某人被解雇的时候，“人们不会承认他的免职是出于反对学术自由，而是因为他无能。”(p.482)20世纪初，经历了



劳资双方冲突、教授与董事会冲突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经历了“罗斯事件”之后，争取学术自由斗争得来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美国大学开始建立对学有所长的教师考核后实施终身雇用教授制度饭碗有了相对稳定性。

但是，民主、和谐社会中大学人感受到压力的背后，没有暴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威胁，与法西斯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相比，没有同质性可言。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却是大同小异。洛维特在《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这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1933年纳粹“革命”之后，洛维特因为是犹太人，几乎失

去了他原先学术圈内所有的友人，包括最亲近的友人贝塞勒、老师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们。即使流亡在日本时，他也时刻感觉到纳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压力无所不在：绝大多数在日本的德国人都小心翼翼地迎合纳粹的反犹思潮。就连1937年到日本作学术演讲的斯普兰格（Eduard Sprager）也一反纳粹取得政权后不久与柏林大学校长科劳施、心理学家苛勒公开宣布与新体制的教育“告别”的那种强硬反纳粹立场，在东京演讲时，斯普兰格似乎“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只能私下对洛维特诉说自己如何受到纳粹当局的密谋和暗算的折磨，描绘德国大学的沉沦。洛维特把斯普兰格行为作为德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典型，做了如是批评：

他是一个德国人，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顾忌，把自己投身于一件任务之中，并将之视为一种爱国者的义务，——于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恶劣之事的責任，——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得很好的工作。（140页）

“不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就放弃良知。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用google检索，涉及他名字的网页最多，超过布代罗尔、克罗斯多芬·希尔、汤姆森、汤因比）的名声之所以战后60余年中不断被英雄化、神圣化，除了他的著作和学术影响外，很大部分源自他生涯最后英雄不屈义举的道德感染力。他1942年起积极投身于地下抵抗运

动，1944年6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与其他19名战士遭受酷刑后被枪杀。但是，布洛赫真正豁出去全力参加抵抗运动，也是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管辖的地域之后，因为他是犹太人，按照维希政府种族法，他失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之职。之后，申请转往蒙贝里亚大学执教也未能如愿以偿。他不得不“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本来他要献身于历史学的。（ペータ・シェットラー，《さらに学ぼうるものは何か？（上）》，《みすず》2010年8月号，6-14页）

二. 清水几太郎的生计忧虑

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是知识分子“转向”的世纪。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日本的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也经历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转向。“转向”，在日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词最初是昭和初年司法当局镇压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制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当局通过司法压力迫使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屈服，改变自己的信仰，转向当局认可思想和信仰。这种思想和信仰的改变，被称作“转向”。50年前，鹤见俊辅、藤田省三发起组织一个“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进行一项关于知识分子“转向”的共同研究，想通过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思想演变的个案研究，强化现、当代日本思想史实证研究之力度。这个民间共同研究，仅有出版社平凡社提供了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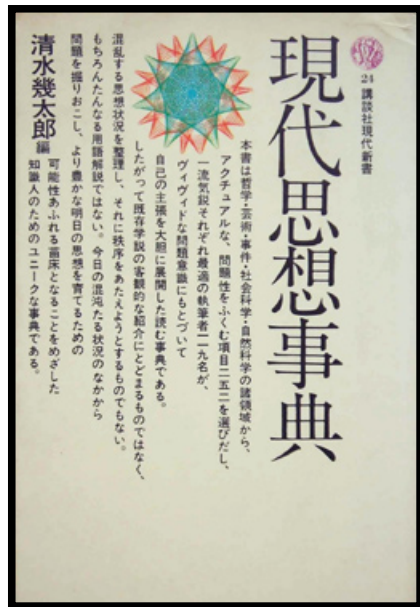
研究经费,1962年平凡社出版了研究成果:《共同研究:转向》,以1930年代后三次知识分子大规模“转向”时期为区分界限,编辑成上、中、下三册,篇幅浩瀚,总共达1500页。从该书1957年改订增补版的最后“文献题解”的归纳统计的“转向者”来看,映入共同研究视野内的知识界的文化名人达300人左右。

50多年前,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对研究对象“转向”的主、客观根源之间关系做了精辟分析:

“转向”其实有时与“思想发展”、“成长”、“成熟”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些词在使用时都遗漏了“转向”受到权力的强制这个核心问题。相反,从“屈服”、“挫折”等词的词义中,只能看到被权力强制这个侧面,却遗漏了思想者本人自发性的侧面。而“转向”这个词包含了强制和自发性两个侧面。没有其他词儿能同时反映这两个侧面的微妙关系。《共同研究:转向·上》,第2页)

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还提出另一个尖锐的重要问题,当时来自权力的压力是否强大到非屈服、“转向”不可?他说:

战后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当有谁拿出关于转向的资料,一提出“为什么当年不得不转向?”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转向)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对这“为了生活”说法,有必要用“为了维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内涵来限定。根据这个“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



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种选择的可能性:1,死亡、2,发疯或其他病态、3,流亡、4,判刑、5,转业、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对这六种选择连考虑也曾不考虑过。……(《共同研究:转向·上》,第8-9页)

鹤见俊辅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两种选择怎么样呢?

转业,在昭和年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也是这个阶段日本史的特征。学者必须依然当学者,政治家、评论家也是如此。与固定的身份意识、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身份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所以他们都拒绝转业来维持生计。这个课题值得注意,需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作一比较。……沉默,……很多人就此会脱离公共生活,难以确保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沉默对于日本的公共名人来说,也是不能

接受的，是一个不能使得“转向”仅仅停留在内心（而必须公开的）原因。（《共同研究：转向·上》，第9页）

当年也有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大学的：1933年泷川幸辰因为批判“治安维持法”被京大解雇后，成了开业律师。日本制造出一个满洲国后，战争势态带来了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老问题，即使有政治前科的知识分子已不难在转向后找到谋生饭碗。（参见拙文《京都大学惯例及其局限》，刊载于今年《复旦教育评论》）

鹤见俊辅等人关于转向的共同研究中，不是单纯分析转向者思想演变过程，不仅注意到他们遭受外来权力强制的类型和程度，还考虑到他们出身家庭、学历、成年后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个人要因。这些要因对转向产生非常重要、直接的影响。中册收录的鹤见俊辅《翼赞运动的学问论》（《翼賛運動の学問論》）一文涉及的清水几太郎转向个案最有趣了。清水几太郎这个人物可以说昭和史上最典型的“转向”代表人物，集“转向”、“假转向”、“半转向”、“再转向”于一身，因此也是一位日本现代思想史上评价具有争议的知识分子。

中国读者大多只知道清水几太郎是个1950年代日本站在安保斗争前列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和平运动的领袖、大学教授、评论家、社会学学者，殊不知清水几太郎在战争时期附和大政翼赞运动，鼓吹战争新体制下“新国民文化”建设的“转向”言行；中国读者大多也不知道1970年



代末起，他从左翼岩波书店的综合性杂志《思想》、《世界》的写手，转变为右翼杂志《诸君》、《文艺春秋》的写手，晚年又在一些文章中[《戦後を疑う》（《中央公论》，1978年6月号）、《日本よ国家たれ核の選択》（《诸君》，1980年7月号）]，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发表为战前治安维持法辩护，主张日本为了强化国防甚至可以核武装等言论，从进步左派文化人的立场上又急骤向右激进“再转向”。这个“再转向”当时引起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很大震动。当文艺春秋社社长和《诸君》主编听到约稿的小编辑说清水几太郎愿意为他们刊物写专栏，简直不敢相信，骂小编辑：“傻瓜，清水几太郎怎么可能为我们文春社写稿呢！”有人称这是评论界的洛克希特事件。

清水几太郎在大学时代、昭和初年曾在“苏维埃之友”左翼团体学过俄文、

读过布哈林的《唯物史论》，对孔德、杜威、西美尔等人思想感兴趣。1933年因为教授户田贞三不再让他当助教，不得不离开东京大学后，他靠为媒体写时评为生，最开始写的文章多是从自由主义立场批判超国家主义。近卫文磨的大政翼赞运动展开不久，舆论媒体受到严格统制，清水几太郎很快顺应时势，“转向”依附国家权力。1938年至1941年为《朝日新闻》写文化专栏。1941年起到战败一直是《读卖新闻》评论委员，专写社论。鹤见俊辅在文章中，认为清水“转向”主要原由是为了生计：“只有写这样的稿子，才能保障生活，自己没有后退之处，既不能回到大学教书，也没有回到故乡去的可能。”因为到他父亲一代，家境败落，上中学时，遇到关东大地震，只能在马路上搭建的棚户里栖身，因为是东京城市出身，连回家乡务农糊口的可能也没有——少年时代遭受的这次生计威胁的恐惧记忆，贯穿一生。所以，他以写稿为生之后，一贯采用隐晦笔法，晦涩的修辞来表达自己思想，避免遭受审查，失去饭碗。战后，民主社会没有这种写作禁忌了，1956年他在《我的心路历程》（《私の心の遍歴》）一文中坦诚说出自己为何一直小心翼翼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相当距离的原因：

我不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行动，……那样的话，不仅不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入高中那年，就实施治安维持法了。对于批判天皇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

搞马克思主义的话，与出人头地是背道而驰的道路。那时这种思想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内心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共同研究：转向·中》，第167页）

鹤见俊辅援引这段回忆文字，证实担忧生计无着落——实际是“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是清水几太郎很快“转向”最根本的动机、原由。战后同属左翼的日高六郎等人曾为清水当年所写的社论辩护：认为他是夹带自由主义思想隐微写作，夹带私货为他的战前写作转向辩解。但是，这种隐晦的话语，全都是在肯定大东亚战争必定胜利，宣传了一大通翼赞运动的陈词滥调后才夹带进去的，除了清水的个别知交会注意到，一般读者谁能体察得到他的隐微写作？不久，倒是清水几太郎自己在一篇题为《体验与内省》（1946年6月号《朝日评论》）文章中为自己辩解、标榜时，却坦白了一点自己“转向”的思想根源：

最近的言论中已经不见10多年战争中的那种痕迹了，讨论到战争时，不是说国民是“反对战争”的，就是说“受了欺骗”。总之，这样的前提，以这个为前提，人们都可以避免自我批判了。其实，知识阶层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从西洋的学术学到的理性精神与经过日常各种社会经验结合之后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在知识阶层内心奇妙地结合起来，并存，有时是分裂的。他们对民族、国家投以轻蔑、厌恶的言语，可是在这样言语背后隐藏着爱。这种爱在表达过程中，就转化为对当时政府、军阀所操纵的日本的

爱。本来应当爱的东西被某个时候应该厌恶的对象所替换了，在无意识之间，爱上了憎恨的东西——为了纯洁的自我反而加深了矛盾。

清水几太郎的晚年急骤向右转，只是这种“沉淀到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再度浮出水面。这位1930、40年代转向追随大政翼赞运动的媒体人、1950、60年代成为反安保条约的左翼进步文化人、1970年代末起，晚年再度向右转的社会学学者——同一个清水几太郎，都是为了这种对民族、国家纯洁的爱而“转向”的？

清水几太郎和前述的博比奥不一样，博比奥是逮捕后面对酷刑屈服，以后内心还是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假转向”。但是清水几太郎最初的“转向”是为了保证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晚年却表现出“纯洁”的信仰，一生“信仰”摇摆不定。❶



ハーバード大学入学時の鶴見
俊輔氏（昭和13年）

生死尘梦一书求



特约撰稿人 张无极（北京，zhangwujibook@126.com）

人世烦碌，终有想象乐土和心灵圣地。藏地就是这样成为人们的避难所的，但凡如此的，最后都变成了迅朽的俗处。因此，后来人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心灵妥放之处：丽江。那是后话了。这里言及的是人们对于西藏的热爱，除了拉萨的蓝天、雄伟的布达拉宫、信徒膜拜的大昭寺、以及凡尘热闹的八廓街，圣湖纳木错，以及藏式情歌，快乐锅庄外，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一百年前，曾经就有一队汉人在一个叫陈渠珍的年轻人带领下艰难跋涉，在这块救赎之地上经历了一段堪称天路历险的动人传奇？那么陈渠珍又是谁？

清代大诗人黄景仁曾经有诗曰：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陈渠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志在四方的好男儿，出生湖南湘西，自古所谓“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此地以彪悍勇敢著称。因此，可以说陈渠珍是一介武夫，只是有所

不同的是他习武之外，又兼从文；堪称文武兼备的一代人杰。传说他一表人材，中等个子，喜穿长袍，不戴帽，不蓄须，脸面清爽，常年光洁，只是眼珠是黄黄的，视之甚是威严。

1922年，陈渠珍的一位乡贤师长将他的小年轻亲戚送到了他麾下，帮他抄抄写写，这个年轻人目睹了陈渠珍是一个极好读书之人，他闻鸡挑灯展书阅读，

“一切都得那个精力饱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掰画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这给予了他莫大的精神鼓舞。这个年轻人就是沈从文。1936年8月9日，沈从文出版其代表作《边城》，小说与情境如诗如梦，语言更是含蓄自然，讴歌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伟大人性。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几乎这同一年，陈渠珍写下了一部私家笔记《艸野尘梦》。这本书的面世稍显曲折，

是经由一个张姓工程师阅后极力推荐在一本叫《康导月刊》上连载，才有机缘被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看到并啧啧称奇：

“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面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

《艸野尘梦》随后便广为流传，可称风靡一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又如山一样的沉重。陈渠珍以艸野喻西藏，以尘梦喻当年经历。昔者曾往，今复来思。它记述的均为清末民初藏地之事，这本自传体小说，或曰私家笔记珍录，以行军日程、所经之地为纵横线，将我们引入一百年前的西藏。所述的援藏、兵变以及自己的机缘巧合比如由管带晋升，以及数次蒙难而大难不死，等等生死传奇。文采斐然，令人手不释卷。

我们要惊叹的是汉字的魅力。它就是这么神奇，我们仿若进入羌塘沙漠，冰川雪地，以及荒原绝境。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今天看客的视角，这里记述的完全是一幅绝版的藏地风光图：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沿途居民寥寥。师行于七月，时方盛暑。身着单服，犹汗流不止。过雅州，则凉似深秋，均着夹衣。愈西愈冷，须着西藏毡子衣矣。过大相、飞越诸岭，皆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俯视白云，盘旋足下。大相岭，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故名。经虎耳崖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俯视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波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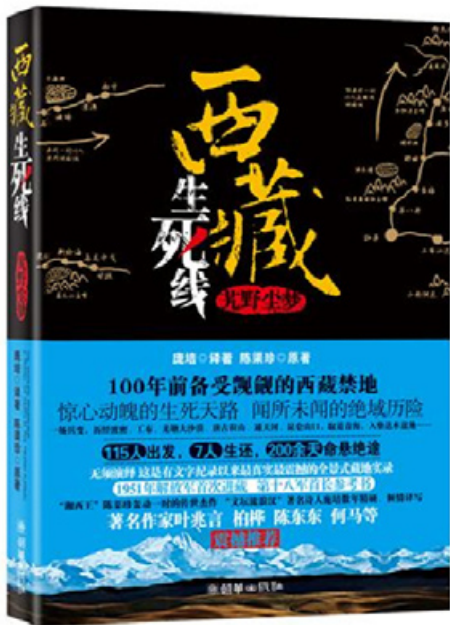
图为陈渠珍

汹涌，骇目惊心。道宽不及三尺，壁如刀削。余所乘马，购自成都，良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进。盖内地之马，至此亦不堪矣。行六日军泸定桥，为入藏必经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夹岸居民六七百户，河宽七十余丈，下临洪流，其深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以指粗铁链七根，凌空架设，上覆薄板，人行其上，咸惴惴焉有戒心。

当然，绝域高原的历险绝非个人所愿，也绝非我们今天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般的游人心态，陈渠珍等人完全是形势所迫，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消息很快传至拉萨，局势人心立即大乱，军中

哥老会积极策应，杀死清廷驻藏统帅，并意欲拥立陈渠珍。而陈渠珍当机立断，决定东归返乡，岂料路途艰险万端。人在生存极限的时候，是最考验人性的。一路荒原，漠漠无望，随时陷入殒命之境，狂乱风沙，饥寒交迫，无一不是对生存意志与人性的拷问。离开藏地，同行有115人，200余天的命悬绝途，除了陈渠珍和藏族女子西原，只有7人生还。可见生死天路之惨烈，至今读过此书的人都会为西原万里从夫的爱情唏嘘不已。如果深究于此，爱在他们之间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知道当初，陈渠珍只是倾心盛赞其马术之精，矫健敏捷，可在马上连拔五竿。那个时候西原十五六岁，在陈渠珍眼里她是一个“貌虽中姿的番女。并非一面倾心一见钟情。出藏险路，西原对其关怀备至，生死不离。入羌塘大沙漠后，陈渠珍的枣骝马丢失，西原把自己的黑骡让给他，自骑劣马。陈渠珍双脚沾雪而肿，西原用牛油烘热熨数日，足遂完好如初。可以说，从一而终，患难与共遂成他们爱情升华的佐证。或许真是这份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真情至爱使陈渠珍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本堪称伟大的小书《荒野尘梦》。

2003年盛夏，地点常熟某一个静谧的小区里，江南诗人庞培读到了这本书，一读便不曾放下，此后他数年如一日将之反复研读。绝域高原的灼热，坎坷，残酷，以及生死与共的爱情，透过文字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无数次透过时光去眺望那个层峦叠嶂的传奇湘西之地一个孤寂



的老人身影，也无数次眺望在沙漠中跋涉发出呼喊的焦灼的灵魂。

无疑，他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他喜不自胜且誉之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鲁滨逊漂流记》。一本数万字的小书，他何止是读了一个夏天，而是读了有七八年之久。他觉得一个伟大作品是具有时光穿透术的，庞培在一篇名为《大山一样的小书》文字中这么记述：我也无数次地听见陈渠珍先生的原文深处，回荡着他手下士兵那些深陷到沙海中去的绝望的脚踵……。他们朝着远方的生还，朝向遥远的人世间艰难行进，周围是比传说中的地狱真实惨酷一百倍的戈壁瀚海，这文字于是升腾起一种决绝的生气，这甚至可以说是说一种野蛮文学的写作，但却是在真真切切地还原着人性，还原着大地上最具血性、粗犷闪亮的人性……。

文学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秘奥案例，比如马尔克斯读到卡夫卡。这种文学奇遇激发了另外一种创作灵感，且不可抑制。于是，诗人庞培停下了他全国各地的漫游，开始坐在书案前进行译写。于是有了这本《西藏生死线：荒野尘梦》。译写文字别有风格，率直挺拔刚中带柔的干净利索，柏桦称之为“西藏小史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两个精美文本的并存，让我们领略两种不同时空，两种语言风格的魅力。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两个执著文字的人在一本书中相逢。说庞培是陈渠珍的隔代知音一点也不为过。 

连雅堂与青山青史



特约撰稿人 贾葭（香港，jiajia80@gmail.com）

西湖北岸的北山路葛岭路一带，我几乎每到必访，尤其坐在临湖的咖啡厅里，呆望着窗外孤山水云，惬意非常。2009年春天的某个下午，我照例来到此处，突然发现北山路在过了香格里拉饭店之后悬有一块酱色的景区标志：连横纪念馆。连横即连战之祖父，号雅堂，《台湾通史》之作者，人皆知晓。只是为何他的纪念馆突然出现于西湖边上？

我迅速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原来连横曾携妻在葛岭路的玛瑙寺短短住过几个月。这玛瑙寺想必大家都知道，张岱在《西湖梦寻》里就提到过，是西湖北岸的一大丛林，原寺早已被毁，仅剩几处遗迹。2006年，连战到杭州访问。两年后，玛瑙寺被修葺一新，并增设连横纪念馆，成为湖滨一个新景点。

这我倒也不奇怪，因为我在西湖的那几天，听说湖北广水投资1300多万重修了连舜宾的墓地。连舜宾就是欧阳修

撰写的《连处士墓表》中的“连处士”，据说是连战的三十一代远祖。远祖尚且如此，祖父连横的西湖旧居岂能不大修特修？我想，一个人能光宗耀祖到宋代的，举世唯恐此例吧。

连横的传记，世所见者，咸推重林文月所著之《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林氏系连横之外孙女，此书最初写于1977年，是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所组织编撰的《近代中国丛书——先贤先烈传记丛刊》中的一种。林氏曾言，这套书当时的读者对象，是以高中学生及社会青年为主，故而行文及篇幅均受一些限制云云。

2010年春，林文月将修订本交付台湾有鹿出版社重新出版。据她说，“几乎每一页都有些修正增补”。目前大陆读者所看到的广西师大版《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即据此版本而来。我看的，也是这一个版本。

图为连横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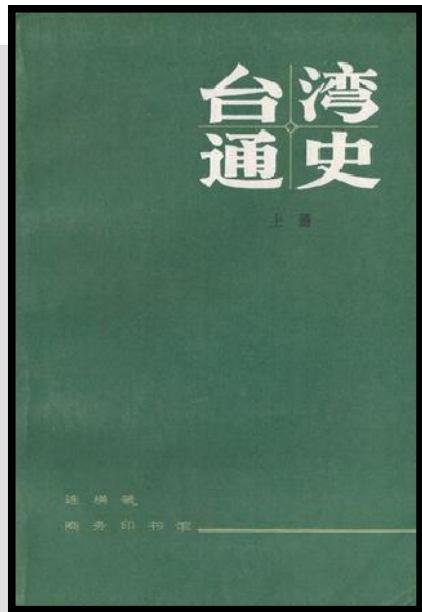
藏之名山

连横为大陆读者所知，当然与连战关系甚大。两岸势如冰火六十年后，连战登陆开启了国共关系的新局，相关著作自然也就得以面世。不过，连横所著之《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在1983年就曾经出版过简体重排本，只不过印量颇少，亦未曾引起太多关注。

我手中的《台湾通史》上下册，是依据民国三十六年的商务版影印的。这部书还有其他很多版本，台湾的众文图书公司曾把这部书列于《台湾文献丛刊》的第二辑，上海书店列于《民国丛书》第三编，台湾国立编译馆曾将其列入《中华丛书》。由此可见该书地位之隆。

至于连战登陆之后大陆所出的该书简体重排本，则毋庸论矣。所谓母以子贵，祖以孙贵，亦在情理之间。早前大陆公开出版的关于台湾史的论著，均以大陆视角出之，亦即台湾史系中国史之一部分。连横此书，稍有不同。其叙述台湾之风土人物，以本土视角出之，视台湾为一独立之个体，开创“台湾史”这一独立学术领域，筚路蓝缕之功，不可谓不大。

例言之，该书之《建国志》即以南明及延平郡王为正朔，及郑氏降清之后，才用大清纪年。《台湾通史》下止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之签订。若再往下写，恐招日人之不满。该书历时十余年，凡六十万言，以太史公《史记》体例为之，亦可见连横对其“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决心。



不过，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学人对此书亦多所批评。在1920年本书在台湾印行之后，台湾学界即对此有过多争议。比如，该书中的涉外关系部分，真实性有待商榷。批评者认为连横不通外文，无法阅读域外文献，仅依靠汉文记载。但是按照林文月的说法，连横学过俄语与日语。当今一些学者也认为，连横并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是“文人著史”，非“史家著史”。李筱峰的批评显然非常激烈，他直指此书“谬误百出”。

这些批评都有些过于苛求。林氏所著的连雅堂传，走的是“以诗证史”的路子，引用了大量连横的诗作。从其诗作来看，连横无疑是一个传统文人。诗胜于文，文胜于史。其对于撰史的态度，并未如现代史家那般严谨。台湾学者黄富三

就曾说过：“比如说引文不注明出处，你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写东西哪有人会写注一是什么注二是什么？”

但后世更多的争议倒还不在于该书，而是：连雅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落魄江湖载酒行

连氏的诗作遗世不少。林著称连横在18岁前，就手抄《杜少陵全集》，开启诗兴。我们在他的诗作里，也能看到他上袭少陵诗风，不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颇近少陵与放翁。这在不少诗句中能看出来。林著大体上是依据连横的诗作，从中分析传主的行为与心理活动。

连氏早年赴上海，入读圣约翰大学。作者称连氏时年“二十岁左右”，那么入读当在1897年。圣约翰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第一个被美国大学承认学分的大学。连横入读俄文，但又很快就辍学（葭案：熊月之编著之《圣约翰大学史》校友名单未有连氏之相关记载）。林著认为，连横读俄语的原因是，未来中国人需要跟俄国人打交道。辍学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催促其返台完婚。

完婚后，连氏并未回沪继续读书，而是进入日本人新创立的《台澎日报》，任汉文部主笔。这家报纸不久后改组为《台南新报》。1902年，连氏还曾赴福建厦门捐得监生，然后参加福州乡试。不过，林著中没有提及纳捐科举之事。其子连震东后来解释说，他去福州是借考试调养身体。



图为连横先生像

其实很难解释为何连横会参加清廷乡试。从作者的叙述中看来，因为清廷割台，连氏对清廷之腐败极为不满。在我看来，连氏对台湾的认识当中，有一个始终无法自洽的矛盾：他一方面奉南明、延平郡王为正朔，不承认清廷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在辛亥革命之后抨击满清宅夏窃国；一方面又极力赞扬以刘铭传、丘逢甲为代表的清廷对台湾的经营。他说，对开拓台湾功勋最高的两个人是陈永华和刘铭传。后来他游历南京时，在天王府曾写有“他年修国史，遗恨在湘军”的句子，可见他对清廷之态度。

连氏的通史终于马关条约。对清廷

割地的评价，至今在台湾学界仍有不同声音。尤其是，此后短暂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一些倾向台独的学者研究之重点，以此来证明台湾与大陆联系是如何脆弱，并建立一种论述体系。不过，当时的“台湾民主国”曾给清廷电报说“台湾士民，义不服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所以连横对于这一段历史，很有些无法下笔之态。

在《台南新报》工作时，连氏开始学习日文。这恐怕是不得不为之的举动。盖因该报系日人投资，又以日文出版。不过此时已经能够看出他在国难之际的心情。他在《马江夜泛》中写道：横槊苍凉夜，艰危击楫秋。他经常以祖逖、稼轩相拟，颇有壮志未酬之心态。他在《鹭江报》写的《惜别吟诗集序》中说，“欲求国国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已初步反映出其反满之一面。

不过，至今未有连氏直接参与革命党活动的记载。林著也是以猜测的口吻，试图把连氏与革命党联系起来。林著说，“1900年国父到台北，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定必消息灵通。他或许往来南北，与孙中山先生会面也未可知。”作为一部传记，以“想当然耳”的手法描述这样一件攸关大局的事件，显然是不大合适的。

1905年，连氏赴福建创办《福建日报新闻》，鼓吹排满革命。按照连震东和林著的说法，同盟会派李竹痴（有的材料作林竹痴）到厦门，商议改该报为同盟会机关报。不过，当时同盟会的刊物已经有

《中国日报》与《民报》，一在香港，一在日本，且当时同盟会在厦门尚无分部，以厦门的一张报纸做机关报，可信度不高。此外，连震东称，后来清廷向日人抗议，此报由是被封。

台湾作家陈柔缙引用连横朋友林申生的说法称：该报关门的原因是，“缘该报社之组织不健全，非清吏向日人抗议之结果；日人特听其自生自灭耳。”另一位和连横亲近的门生张振梁也有不同说法，认为连横创办该报的原因“乃其时台局粗定，日人招徕台人故。”

至于林著中说的清廷要暗杀连横，更是无可考证之事。连横在报馆关闭后回台，仍入《台南新报》。此后一边写书，一边纵情诗酒，成立诗社，酬唱往来等。台湾诗人林馨兰在《读诗界革新议及后等书》中评价连氏的诗，“雅堂过于纵。”亦可见其性格为何。

1908年，连氏曾赴神户一游。林著称，“他此度赴日，或者竟是借游览之表面行为，实则去参加在日本的革命计划也未可知，因为神户乃是当时海外革命志士的一个据点，国父每次到日本，也都在神户与当地华侨志士联络商议的。”在读林著之时，我一直对作者试图把连氏和孙中山联系起来的描述，抱有甚多疑虑。

鸦片事件

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知名知识分子，连氏与日本人之关系颇可留心。他供职的多家报纸均系日人所办，这倒也有情

可原，因为日人为殖民计，推广日语，在北中南创办多份日文报纸。如果在台湾要做报人，只能托庇其下。

连氏通史出版后，曾请“明石台湾总督阁下”（明石元二郎）、“田台湾总督阁下”（田健治郎）等日本政要题字（后者题“名山绝业”四字）。《台湾日日新报》主笔尾崎秀真、《台南新报》主笔西崎顺太郎、总督府总务长下村宏三人，各为该书撰序一篇。林著对此的解释是，“这完全是委曲求全，在异族统治之下不得已的办法。”

此外，1930年3月2日，连氏在日本官报《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新阿片政策讴歌论》的文章，引起台湾士人的联合反对。当时全台士人皆在反对日人之鸦片政策，而连氏文中则说：台湾人之吸食阿片，为勤劳也，非懒散也……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阿片之效乎？

连氏所参加的诗社“栎社”亦开除其社籍。台湾名士林献堂在其3月6日的日记中对连氏极表不满。从此连氏与台北士子分道扬镳。林著中说，此文系他人冒连氏之名而写。盖因连震东学成归来，欲入《台湾民报》做记者，引起他人嫉妒和恐慌，为破坏连震东的工作，有人假名撰文云云。此说不为正统学界接受。台湾学者陈明道就曾说，“此文是连雅堂一生之污点。”

由此可见，林著为尊者讳过于急切，以至与学界研究轩輊之处，也未加以订正。台湾学界如今对连氏之评价，对其

亲日之态度颇多不满（见林元辉《以连横为例析论集体记忆的形成、变迁与意义》）。从日人据台到连氏离台这三十多年内，连氏供职于日人之报纸达十七年，其对日人之态度，并未有如林著所说那样决绝。

例言之：1899年，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在台南开庆典，《台澎日报》汉文版发起征诗。连氏撰《欢迎儿玉督宪南巡颂德诗》，中有“我公秉节莅封疆，除残伐暴登仁寿”之句（葭案：此诗未载于连氏诗集）。嗣后每一任台湾总督到任，连氏都曾撰诗颂之。1923年4月，日本皇储裕仁到台，连氏献《台湾故事十题》进之。1930年日本人搞的“台湾文化三百年”纪念会，连氏是十位顾问中唯一的台湾人。这样的态度，让其与本土士人愈行愈远。

此外，在其离台之前，连氏曾数次赴大陆旅游，交友广阔，皆是学术官场名流，所以名气也越来越大，知道他的人也很多。在大陆人面前，连氏则是一个报国无门、胸怀壮志的边疆烈士。章太炎在看过其诗文及通史之后，就曾夸他“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他很早就给国民党元老张继写信赠书，张继颇推许之。

1931年4月，连氏写给张继请求照顾连震东的信，读来让人动容不已，林著亦曾引之。信中有此一段：

“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

心，其何能恕？所幸国光远被，惠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钟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惟亮鉴。”

如果把这封信和之前的颂德诗放在一起，很难相信其居然出自一人之手。当年6月，连震东到宁，在吴铁城处谒见张继，张看了此信，表示“真契沉痛，大义凛然，深为感动，历久难释”。此后连震东寸步不离张继，张赴西安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时，即携连震东前往。此即连战生于西安之因。

连氏离台前夕，已经与台籍士人毫无过往相从之举。给其子震东之家书中说，“吾不欲汝为台湾人”，“切不可与此间（葭案：指台湾）朋友通讯。”他还曾告知长女不可返回台湾。连震东在大陆，亦以连氏哲嗣身份颇受优待。震东晚年接受《青年战士报》访问时也曾承认此点。他说，“没有先父当年的苦心安排，就没有今天的我。”

连氏周旋于日人与国民党之间，其言行，日人及国民党人均只见其一面。

英雄的诞生

连氏1936年病故于上海。其骨灰十年后由其孙连战奉迎回台。此后，连氏逐渐进入意识形态的正统话语之中，其形象一再被拔高，直至成为“民族诗人”、“抗日诗人”、“爱国史家”，“台湾知识分子第一人”等，颇有舍我其谁之态。此形象之变化，皆系国府迁台之政治需要。



林文月

《青山青史——连雅堂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国府播迁到台之后，追随国府到台的复旦大学原历史系主任、天主教神父方豪，首先注意到连氏。他曾写数篇文章介绍连氏之思想文章。方第一篇文章便是《连雅堂先生之民族思想》。后来，方豪将连氏之事，告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张对连氏亦有所闻。1949年12月，张在台湾文化协进会演讲，表扬连氏说，“阐扬华族的民性，表彰春秋的大义，他实在是中国近百年史学界罕见的伟人。”此年3月1日，蒋中正复行视事，张获任中宣部长，建议褒奖连氏。故连氏是台湾第一个获得总统褒奖令的人。3月25日总统令下，全文照引如下：

台湾故儒连横，操行坚贞，器识沉

远。值清廷甲午一役弃台之后，眷怀故国，周游京邑；发愤著述。以毕生精力勒成台湾通史，文直事核，无愧三长，笔削之际，忧国爱类。情见乎辞，洵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为今日光复旧疆、中兴国族之先河。追念前勋，倍增嘉仰；应予明令褒扬，用示笃念先贤、表彰正学之至意。此令。

国府败退台岛后，痛定思痛，检讨失败之因。1950年8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中正亲任主席。改造首先从思想上开始，即统一精神（见蔡玲、马若孟《中国第一个民主政体》）。其次，国民党在台岛可算是“客居”，亟须召唤台湾本土之爱国精神。爱国，即爱党、爱领袖也。因此，早前“眷怀故国”的连氏，成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一个树立的爱国模范，绝非偶然。

此年系连氏去世十五周年，张其昀数次讲话，提出“台湾精神”。其要点无非是：连横是“爱国保种”之模范，“爱我祖国，保我华族”，连氏通史之力量，超过日本海陆空三军，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要发扬台湾精神，以洗神州陆沉之耻。此后，傅斯年、方豪亦开始追随张其昀的调子，鼓吹连横是“台湾文化第一人”。魏清德呼吁要印连横全集。改造委员会委员十六人，唯一的台籍人士，便是连震东。

第二年，连氏便进入各种初高中的国文课本。初中多节录《台湾通史·丘逢甲传》，高中课本收入其《台湾通史序》。张其昀的讲话稿也被收入教材。这就是后世台湾人皆知有连横之原因。连氏逝世20周年时，张其昀在台湾师大演讲，题目为《台湾大儒连雅堂》，推许连氏为“最伟大的台湾人”，“全国青年的模范人物”等。

即便国史馆长黄季陆早就考证并指出连氏不可能是革命党人，但一些学者仍然对连氏极尽溢美之词，奋不顾身地给连氏贴金，称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甚至这个结论还进入了教材，而林著对此的态度是暧昧以待。林元辉后来评价说，“至此连横已俨然无德不具、无功不与、无言不立，成了另一尊神格化人物。”

两岸如今出版的通史，早已去掉日人的三篇序文，取而代之的是四篇序文分别为林炳昶、章太炎、徐仲可、林南强所做。顾林著乃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又系官定文章，再者传主为作者之外祖父，难免为尊为亲而讳，多有附丽溢美之处，今人似不应苛责。

如今台湾的许多公园、公共场所以连横命名，这是神化连氏的后遗症之一。我们亦从中窥到党国机器与个体命运之关联。连氏三代后人亦得以庇荫其下，乃至其远祖连舜宾亦因此重获后世重视，不得不说，乃系此通史之力也。Q

波士顿情书之六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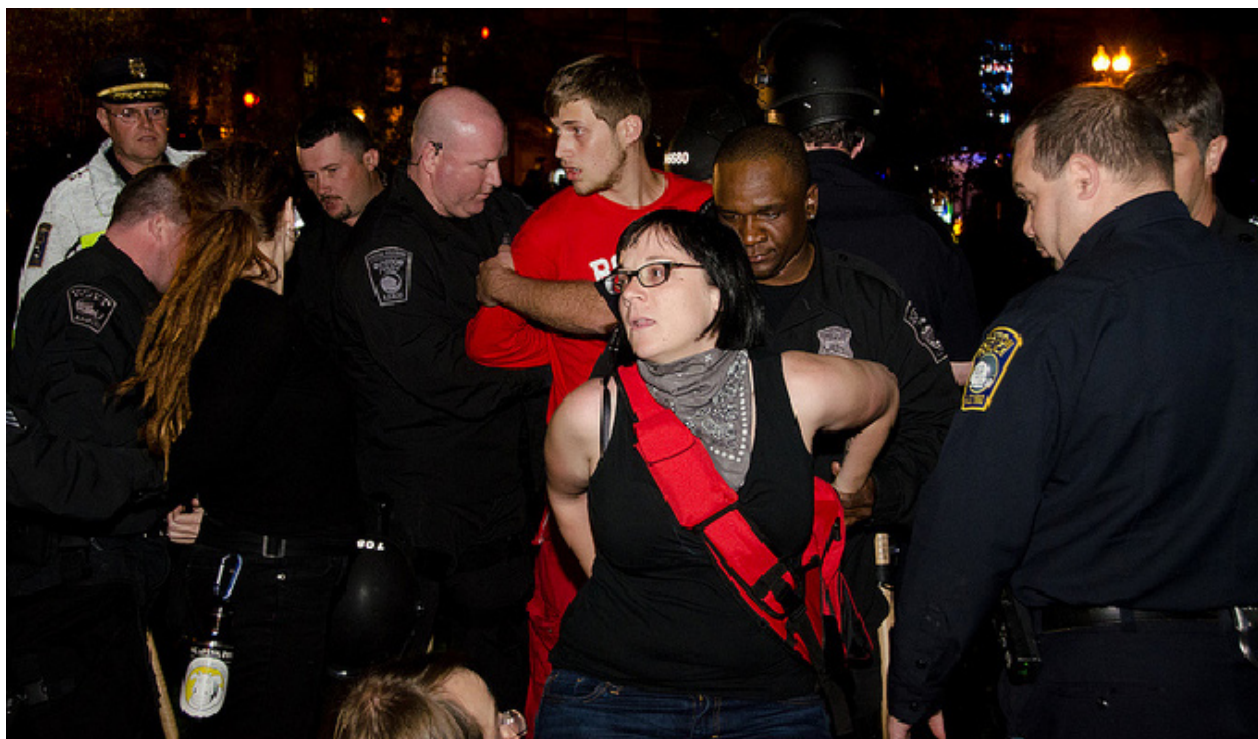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here;
What it is ain't exactly clear.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到底怎么了, 谁也说不清楚)

X, 这是Buffalo Springfield乐队的一首作品<For What It's Worth>中的两句, 作品表达的是对1966年在洛杉矶日落大道上青年被警察镇压的抗议。如今用来形容眼下这场突如其来的occupy行动倒是挺合适的。

1.

据说, 最富有社会运动经验的是美国人民。建国两百多年, 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就没有停歇过。第一次走进帐篷广场, 我便被波士顿人民的斗争经验所折服。

听说有东北大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学生参加抗议示威了, 第二天一早, 我便



逮捕现场



赶去杜威广场 (Dewey Square) 看那些帐篷。此时, “占领波士顿” (Occupy Boston) 行动已经开始整整一个星期了。我在地铁里的免费报纸《METRO》上, 看到这个行动一天天从无到有, 一步一步扩大: 一开始只是200人左右在波士顿公园 (Boston Common) 聚会; 接着在杜威广场扎帐篷, 日夜抗议; 再接着在大本营办各种学习班, 最重要的一个班是教你如何 exercise rights。让我几乎喷饭的是禅宗静修班: 看着一个穿西服的洋小伙在一顶帐篷里低眉垂目打坐样子, 让我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在开party。

9月30日, 波士顿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 有两千人参加了 “take back the

city” (夺回波士顿) 的示威游行, 大概有25人被警察逮捕, “因为他们原本就想被逮捕。” 就是在这次游行的当天下午, “占领波士顿” 开始在波士顿金融区杜威广场搭帐篷的。在此之前, 他们就已经在波士顿公园召开全体大会商量这个行动。在9月27日晚上第一次General Assembly (全体民主大会) 上 (大约200人), 抗议者们便分为legal、food、art and culture、media、medical、logistics等几个工作小组分别讨论了四个小时, 讨论了包括洗澡、睡觉、吃饭等各种问题的细节。在第二天同一时刻举行的第二次民主大会上, 又通过了工作的大体原则, 如每天各个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需要汇报工作情况, 大家一起讨论策略, 以指导下一步工作; 所有决议需要75%的人同意才算通过。此后, 几乎每天晚上七点都会举行General Assembly, 这次行动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采用这种简单直接的民主形式进行的, 大到策划游行, 小到发言的纪律, 乃至吃喝拉撒, 在哪里抽烟不许喝酒等。而会议纪要总是能第一时间在网站看到。正是这个高效而又务实的民主大会, 让“占领波士顿” 这群虽然没有组织者领导者的“乌合之众”, 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 在波士顿的金融中心建立起一个极其成熟的社区: 食品、媒体、医疗、后勤、安全、标语等工作帐篷各司其职, 所有人忙而不乱。甚至还有spirit (精神)、library (图书馆) 等帐篷以及各种流动的简单音乐会, 提供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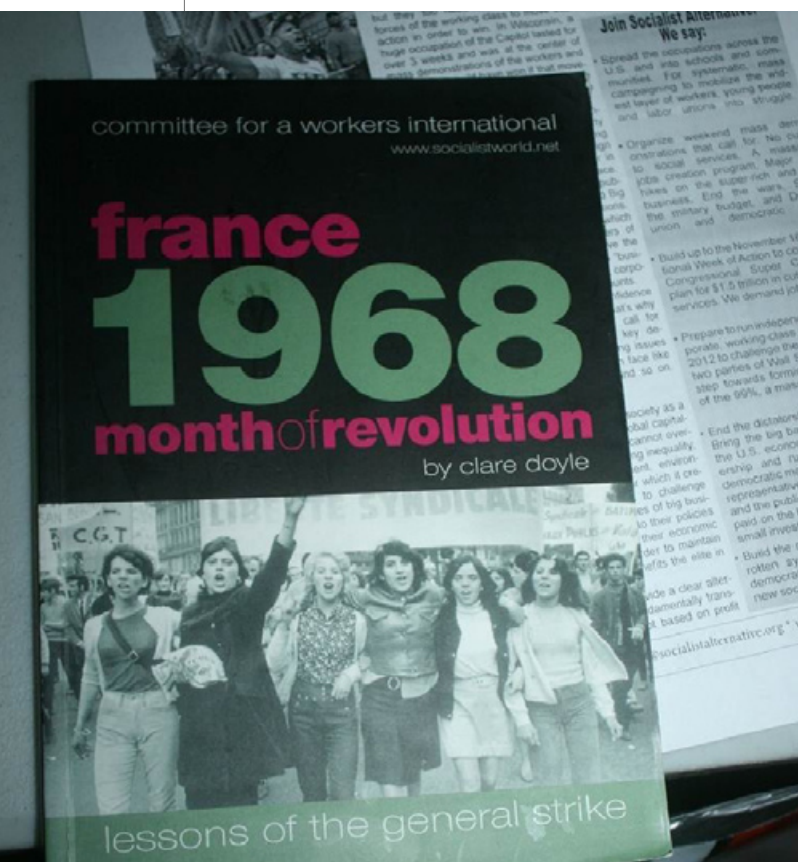
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务,一切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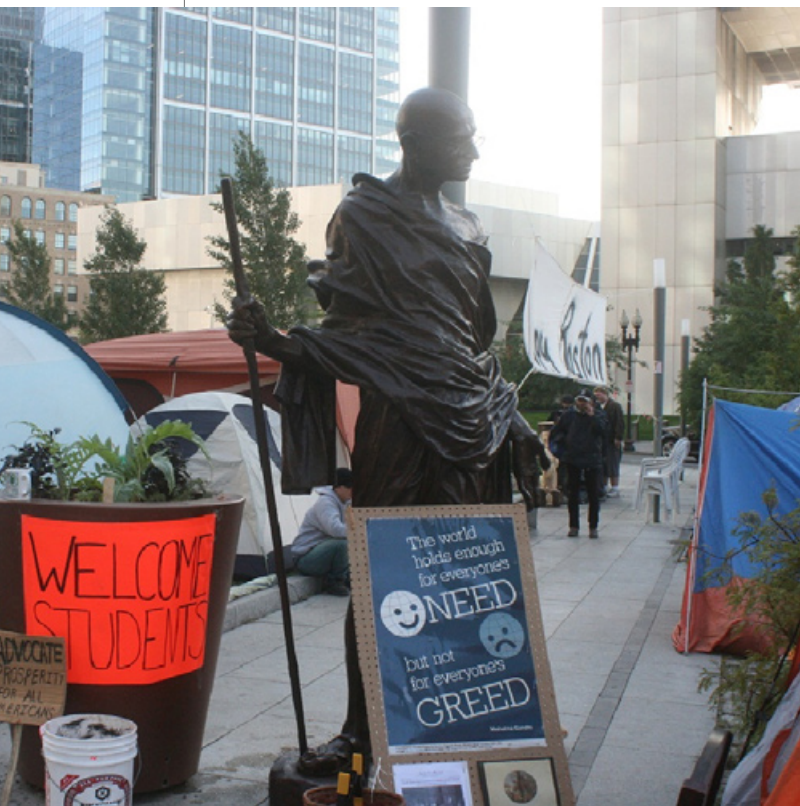
因此,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几乎络绎不绝,有外地游客也有波士顿本地居民,有中学生也有学者,当然最多的还是记者,任何时候总是能看到一大群的记者在拍照采访。各种政党、宗教团体,乃至个人,趁机做宣传的也不乏其人,最为活跃的莫过于美国的左派政党,如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alternative)短短十几天内,在这里发了他们三期的《正义报》(justice),并拟定在11月12日到13日,召开新英格兰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探讨主题是什么马克思是对的;又

如共产主义革命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不仅在这里派送他们的报纸《革命报》(revolution),他们党主席Bob Avakian还亲临现场,宣传自己的著作《Basics》,书中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此外还可以看到不少“左派”书籍,如美国记者John Reed 1919年写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Marxism in today's world》、《Che Guevara——symbol of struggle》、Clare Doyle的《France 1968 month of revolution》等,似乎这次占领行动所显示的社会危机,再次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世界,也是革命的最好时机。对此,我更愿意接受公开支持“占领华尔街”行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当下美国金融市场的判断:

“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好在,对于占领行动的那些成员来说,这些政党的宣传活动与宗教团体现场举行的宗教仪式没多大区别,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空泛的主义和理论,而是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一次性纸杯不够用了,注意自己的公共举止。

不过,大本营里最引人注目的入口处苦行僧人打扮的圣雄甘地的铜像。这是组织者从本地的The Peace Abbey(和平寺)借来的,塑像下有大写字母的标语“REMEMBER TO BE KIND”。





在介绍这尊铜像的文字里，最后引用了甘地的话：“The Word Holds Enough for Everyone’s Need, But Not for Everyone’s Greed.”显然，“占领波士顿”的行动纲领与目标全在于此了。而他们的定位是“Occupy Boston is the beginning of an ongoing discussion about bringing reform to Wall Street and removing special interests from government.”（“占领波士顿”是有关改革华尔街和去除政府特殊税的持续讨论的开始。）“we are gathering to express a feeling of mass outrage against the bank bailouts, Wall st. greed, and the corrupt political system that we

are all living under. We urge you to come to Dewey Square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about how we—the 99%—can create a society based on freedom, justice, and equality.”（我们聚集在一起只是想表达大众对银行救助、华尔街的贪婪和我们所有人所生活于其下的腐败的政治体系的愤怒。我们希望你到杜威广场来加入我们的对话：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我们怎样才能建造一个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

这让我开始彻底修正自己对这个行动的看法，仅仅因为他们执着的天真与严肃的梦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态度，以及他们冷静、理性、平和、认真的行事原则。这不仅是帐篷广场、民主大会给我的感受，即便是在游行示威最热烈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冷静与理性。

在“占领波士顿”行动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专门跑去广场等候游行。果然，下午四时，游行队伍突然从广场冒出来，穿过马路到对面美联储的大厦前。也就是说，这次游行的距离就是穿一条马路，最多五十米，不到一分钟就游行完了。然后大约200人左右聚集在美联储大厦前，接下来一切按步就班：先是站着喊了五分钟口号，接着坐着喊。然后就是自由发言，大部分仍是喊口号，比如我们是99%、向富人征税、停止战争等，一人呼，百人应，颇有气势。此时，有个不识趣的家伙喊：“Fuck the government!”响

应者寡，却引来一片尖叫。于是，又有一个更不识趣的家伙立即接着喊：“Fuck the rich。”响应者寡，但又是口哨又是尖叫。这时，立马有组织者站起来宣布纪律：所有的问题和建议都必须先告诉在场的书记员，由他先记录问题，然后才可以大声宣告。其中一个皮肤稍黑、带着眼镜的儒雅青年的质疑颇好：我们提了这么多问题，有没有去想一个解决之道呢？这个问题，正是这场如今席卷全美运动的死穴——没有具体的指向和目标，这让许多人都对此不以为然。不过，我想即便没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即便过于理想，但有这样的抗议已经足够了，有这样的思考已经足够了。

2.

什么是自由？X，对于这个美好而空泛的词语，我一直无法体会其涵义。不过在帐篷广场蹲点一个星期后，这个词语开始变得无比具体和细微了。

第一次到帐篷广场，我就得到一本附有《独立宣言》的美国宪法小手册。这次活动的第一把尚方宝剑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虽然只有短短45个单词，不过Occupy Boston网站却详细告诉你，据此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言论自由和聚会自由，是不是就不需要许可了呢？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只要呆在人行道里，遵守交通规则，但以下三种情况除外：1 不局限于人行

道上的或会阻碍交通的示威或游行；2 需要使用扩音器的大型聚会；3 在一些指定的公园或广场的聚会，比如波士顿公园。

然而，在第二次民主大会上，Occupy Boston通过决议，决定不去申请许可便开始扎营。那么，他们在杜威广场扎的帐篷营以及在波士顿公园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不是违法的？对此，我一直充满疑问，并和隔壁留学生小小讨论了一番。在仔细学习他们的宣传材料后，我终于找到答案：虽然以上三种情况需要许可，但是，因为办理这种的许可程序需要几个星期，所以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不允许这种的程序来妨碍或是阻止那些迅速发起的、不可预测的游行或示威。而且，在许多许可中，通常还有许多附加的规定，比如游行的路线、扩音器的分贝量等，如果这些东西并不妨碍交通或危害公共安全，这些规定已经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这些规定妨碍了游行队伍与民众交流，即妨碍了言论自由。这就是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许可，这些帐篷们都是合法存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二十四小时持续不断的游行或是示威都是合法的。

第二把尚方宝剑更是管用，这就是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一句话：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任何人都有权不做对自己不利的证人）当然，这句话是用来对付警察的。在网站上，Occupy Boston详细告诉你如何对付警

察，甚至还有专门的视频，由专业律师教你如何做。通常警察找上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谈话，谈完就走了；二是拘押，此时，就需要用上这把尚方宝剑，对警察说：

“I am going to remain silent. I want a lawyer”。这时警察就对你无可奈何了。第三种的级别更高一些，这就是逮捕。当然，拘押很容易转为逮捕，此时，更是需要挥舞这把尚方宝剑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同伴，不对警察说一个字。网站上甚至提醒，若是警察带着逮捕令来逮捕你，你最好走

出房门然后把门关好，然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房间。这样警察是没有权利搜索你的房间的。千万不要做的是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因为警察有逮捕令，是有权利破门而入，并搜索你所呆的房间的。

在行动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杜威广场上还有专门对付警察的传单在发放，告诉人们遇到警察找麻烦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甚至还有详细的图表告诉人们怎么对付逮捕、上法庭、判刑、上诉等一系列的事情，看到如露天大party似的帐篷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很happy样子，我当时真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也太紧了。没想到，过几天这些真都用上了。

10月11日，一早起来看到Occupy Boston的网站上连贴出三个告示：警察在凌晨一点半进行了野蛮袭击，逮捕了一百多个人；然后是招募保释金约4000刀；然后是现场照片和视频。我一看，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前一天，波士顿的学生和工会一起游行时，警民关系还其乐融融。波士顿是大学之城，而美国工会一向很强悍，再加上那天是哥伦比亚日，所有的地方都放假，所以游行几乎撼动整个波士顿。下午一点，我跟随游行队伍从杜威广场走到波士顿公园，不久，又有两支队伍来汇合，接着所有的学生一起从波士顿公园一路游行回杜威广场，一路走一路喊，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直到和工会组织会合，那会师的场面远远超出国庆日的盛典。而自



警察大规模突袭

始至终，都有几位警察默默在前面开摩托车引导开路，指挥交通，配合得很默契。

于是，我赶紧去地铁站拿报纸，一看，原来帐篷营地不够用了，有人开辟了第二块营地，而这个地方刚刚花了15万美金修整好。于是，市长命令他们在午夜之前撤离，正热血沸腾的革命同志哪能这么听话！于是，便发生了十几个辆警车呼啸而去逮捕一百多人的“野蛮”事件。不过，当天下午，这些人都会被释放了，每人交了50美金的罚金。因为此时的他们，似乎在舆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谁敢真的动他们？地铁里的免费报纸《Metro》第二天用黑体字大大地写道：You can't break us。另一家报纸《THE BOSTON PHOENIX》则在头版放了一张大大的黑白照：两位穿黑色警服的警察的手拽着一位穿白色T恤的瘦弱青年，跪在地上手被反扭着无力反抗的青年

瞪着眼睛看着前方，边上土黄色字体写道：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这就是民主看上去的样子）。

当然，在言论自由的美国，对这些扎帐篷的革命志士冷嘲热讽的也不乏其人。如评论家Michael Graham便尖锐嘲笑说，再也没有比看着一帮身穿300美金的牛仔裤、用500美金的智能手机的人发短信说自己从五万美金一年的大学里旷课去参加抗议有钱人的贪婪的游行的事情更为好笑了。在这篇《occupy elsewhere》的文章里，作者还批评市长纵容这帮人非法占用公共场所、阻塞城市交通以及将附近公司的卫生间像长了大水似的，还偷走了南站公共卫生间里的所有肥皂。总之，他认为这场行为就是“Spoils for the spoiled”（宠坏被宠坏了的）。

同样是这家波士顿发行量最大



占领现场后勤部

的报纸《HERALD》，还用大标题写道“CAN’ T WE GET ALONG?”（我们怎能再这样下去？）。同时还对比列出波士顿和纽约为此次占领行动所付出的：若是这场行动持续到10月31日，波士顿将要付出两百万的警力和十万美金场地维修费用；而纽约至今已经付出了1.9百万的警力。于是两位市长的态度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像以前表示支持和理解，而是变得颇有微词。波士顿市长Menino甚至对自己的逮捕行为解释道：“我不能容忍这种不抵抗主义。”并认为“他们应该有一个离开的时间了，我们近期便会做出决定。”

不过，对此，Occupy Boston另有一套说法。他们说，他们在午夜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管理者的口头同意，他们有权力在那里扎帐篷，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募集资金修复他们损毁的场地和草坪。当然，他们更为强调警察无缘无故逮捕和平抗议者，并强调他们所奉行的是不抵抗主义，这是他们在全体民主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

第二天晚上，我看到Occupy Boston网站上贴出最新通知，纽约的兄弟组织“占领华尔街”此时正在开紧急民主大会，讨论是暂时撤离还是继续坚守。因为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下令，他们需要当晚撤离以便打扫公园里的卫生了。当然，卫生打扫完毕，他们还可以回来继续行使他们的权力，但不许带帐篷、睡袋、垫子之类的东西。因此，“占领华尔街”的同志们认为市长找打了一个结束行动的好理由。

“占领波士顿”兄弟姐妹为此也呼吁大家献策献计，一起对付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波士顿的帐篷营地也凸显出来了。且不说毁坏的地皮，单食品帐篷前可怕的垃圾桶以及后勤帐篷外一大袋一大袋的脏衣服，以及可怕的冬天的来临，就让人怀疑他们能否坚持到明年春天？

此外，Occupy Boston成员的一些不文明举止，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Fox媒体报道，有一位妇女路过广场时，一位Occupy Boston成员向她吐痰，而且吐了两次，而且之后还扔了一个空矿泉水瓶，而且刚好还有证人证明以上属实。又如最贴近老百姓的报纸《METRO》报道说Occupy Boston成员们在公共财物上乱涂乱画，比如在三个并排的黑色大垃圾桶上喷上白色的“Occupy Boston”的大字，而这次是有照片为证。虽然在网站上，Occupy Boston对此做出了解释和道歉，但显然，这帮既嬉皮又嘻哈的年轻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做正事，尤其不像是做民主和自由这么崇高而正义的事。

这下，我彻底糊涂，孰对孰错？美好的民主与自由咋能这么丑陋和世俗呢？幸亏，我只是一个国际打酱油的。不过，也因此，我始终不太同意将美国的这场占领行动和中东地区的暴乱联系起来，因为这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前者是自由民主的表现，游行示威可以进行到底；而后者正相反，是极权专制的后果，一游行示威便彻底死翘翘。

3.

对于眼下这场如火如荼的占领行动，有媒体戏称，正是通过纽约“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纠结不清的电线、电源插座、路由器及在中央公园地下的燃气发电机”点燃的，显然，Occupy Boston也非常清楚媒体的力量，这从他们网站以及他们的Facebook和Twitter便可以看出来。在他们的Media帐篷里，我没有看到发电机（或许在地下吧），不过纠结不清的各种电线和接线板以及电脑、扬声器、麦克风等电器设备确实让我有些头怵。这个帐篷是唯一有电的，当然只供Media服务。据说八月伦敦暴动之后，英国首先卡梅伦认为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Facebook和Twitter这个两个社交网站，甚至提议关

掉这两个网站的服务。而这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除了这个两个社交网络外，还有一种令人称奇的新型软件vibe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示威者正是通过这种软件用智能手机进行交流的：因为它允许用户们在一定距离共享信息，并可以匿名转发消息。用户可以设定信息保留时间发送距离长短，时间一到，信息自动删除，这样就连警方也无法查到信息发送者。据说，该款程序的设计者赛义德就是通过自己的程序知道了纽约街头的游行和抗议的。在“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开始的第二天，他便从加州赶到了纽约占领行动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13日，当纽约市长要求占领成员当晚撤离大本营以打扫卫生时，就在他们召开紧急会



帐篷广场

议商量对策的同时,各地的兄弟组织也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为他们出谋划策,波士顿更是派出支援团连夜赶到纽约,加入了当时正在百老汇大街上进行的数百人的游行,第二天凌晨,纽约市长收回成命,于是游行示威更是汹涌澎湃,第二天(10月15日),“为世界改变而联合”的全球抗议活动通过网络以及各种信息手段正式发起,预计在10月29日出现一场全球性的游行,向11月在法国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首脑们传达他们的诉求。

为此,每次路过Occupy Boston简陋的Media帐篷,我总是对它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并抱着一种简单乐观的态度,觉得在这里,几乎一切皆有可能,美国社会不就是靠这个推动的吗?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各种运动,至今仍然有着他们的回响。刚去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帮主不就认为自己便是六十年代的精神产物吗?如今的奥巴马总统不就是当年黑人民权运动的受益者吗?虽然不少人直接称呼这群“乌合之众”为“暴民”,可是谁知道这群举止不够文明、乱涂乱画,滥用公共卫生间、损毁公共场地、浪费不少警力的“暴民”,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呢?

在10月5日occupy wall street行动小组自己发行的第一期occupy wall street journal《占领华尔街报》头版,

有黑体字写着这么一句话:“how many times in life do you get a chance to watch history unfold.”(生命中,能直面历史的机会能有多少次),波士顿帐篷广场上那个项戴狼牙手缠佛珠,主持着民主大会的腼腆青年会不会就是历史呢?为此,X,我有些忐忑。

4.

X,说起来,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Occupy Boston当初之所以能将杜威广场变成帐篷广场所依据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谁知两个多月后,12月8日午夜,Occupy Boston同样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撤离杜威广场。这中间也真可谓一波三折。

且说,10月14日晚,就是Occupy Boston同学们纷纷跑到纽约支持同道、纽约市长被迫收回打扫卫生的成命的那天晚上,一场occupy历史上声势最为壮大的游行也因此爆发,队伍先是在摩根大通银行门前示威,随后挺进时代广场。据WNBC报道,有1万至2万人,而据Occupy wall street自己报道说,有大约5万人聚集在时代广场。也就是在那一天,全球还有87个国家951座城市发生occupy行动,我忍不住想象了一下:若是有一个外星人站在茫茫宇宙中,盯着地球看了一天,结果无论何时都看到一帮人在高喊“occupy”,他会不会因此怀疑地球停止了自转呢?

自此Occupy Boston貌似也进入一

个黄金年代,帐篷社区变得越来越成熟:媒体帐篷由一个变成前后两个;新建了一个即便是游客也可以进去闲逛甚至坐下来看书的图书馆帐篷;然后在间隙处又出现了一些小帐篷;路边还出现一个大帐篷提供免费的衣物;接着又开始印刷自己的报纸,开始召集更多的自愿者。甚至有一天,我还发现一台装有摄像的电脑,任何人只要按下鼠标就可以对着电脑留下一段在帐篷广场的影像。而所有的人整天欢天喜地,因为这里的生活确实精彩。在这里不仅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参加瑜伽训练、歌舞表演之类五花八门的文化活动,甚至还可以在每天傍晚的民主大会上大声喊“I PORPOSE”,表达自己的意见,实践下自己的政治权利。这让我对杜威广场上的帐篷们保持着绝对的乐观态度。哪怕一个月后,全美上上下下的帐篷们遭到了严重的清除行动,我对波士顿的帐篷们的信心依然保持到春天。

11月15日,全球大串联后整整一个月后,纽约市长再次打出打扫卫生的牌子,要求午夜之前撤离。这次纽约市长动真格了,动用了防爆警察进行强制撤离行动,逮捕了将近两百人。与此同时采取强制清场行动的还有Oakland、Portland、Oregon等几个城市(一位网友在其博客中别有用心地提醒读者,总统先生奥巴马此时正在国外进行访问),其造成的局面如一个网友所说:“这下捅了马蜂窝,将更多的人蜂拥而动(Knock over the hive

and even more bees will swarm).”如Occupy Boston立即聚会进行示威声援活动。不过,虽然这一次Occupy Boston没有遭遇强硬的清场行动,但却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清场”行动:警察禁止任何过冬设备带进帐篷广场。虽然警察们使出的牌子是“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但媒体们与占领行动者们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波士顿市长“freeze Occupy out”(把“占领”冻走)策略。为此,就在纽约同道被强行清场的那天,Occupy Boston最高权力机关“General Assembly(民主大会)”的委托律师团、来自“the National Lawyers Guild”和“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民权律师们向麻省高级法院提出诉讼,试图从美国《宪法》和《麻省权利宣言(THE MASSACHUSETTS DECLARATION OF RIGHTS)》中为占领者以及他们的帐篷们找到存在的法律依据,同时他们还向法庭申请一项禁令,以阻止警察进行另一场午夜袭击捣毁帐篷。实际上,这也是纽约祖科蒂公园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占领者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法庭判决占领者可以一个星期七天二十四小时inhabit(住)在祖科蒂公园,可是却不允许他们再搭建帐篷或是其他服务设备。于是,在其他主要城市受挫之后,Occupy Boston的行动更是令人瞩目,《The Boston Phoenix》甚至用“CAN BOSTON SAVE THE OCCUPY MOVEMENT?(波士顿能够挽救占领

行动吗?)”作为这周的封面标题,因为Occupy Boston与波士顿市长就在第二天(11月16日)便对簿公堂了:从9月30日占领行动伊始似乎便想赶走这些占领者的波士顿市长Thomas Menino认为,只要他认为公众健康与安全受到威胁,便有权力驱除抗议者。他在法庭辩论的时候还说,他有权力在没有事先警告和得到法庭允许的情况下下令驱除抗议者。实际上,法庭上这场辩论焦点集中在:秘密驱除的做法是否更有效更有秩序。不过,不管怎么,Occupy Boston的同学们当天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因为法官Frances McIntyre通过禁令,禁止波士顿官方以及警方清除任何帐篷。当然,此禁令有效期仅到12月1日法庭再次开庭。

于是,我和Occupy Boston的大多数成员一样,依然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就在11月9日,Occupy还占领了哈佛校园,在著名的哈佛先生塑像前扎了几顶帐篷。当然,校方为了学生安全,拒绝让没有哈佛IDD的人进入校园,为此,抗议者们在校门口坐了一夜。因此,我没有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法律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无论是贼还是兵,都得听从法律。而不知何时起,占领行动的宗旨目标已经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占领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12月1日,高级法院再次开庭,双方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辩论。官方代表认为,占领行动让人忧心忡忡,如消防部代表指出帐

篷是易燃物,为此他每天都担心那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因为那里每天违反防火安全条例的事情多到胜不可数。此外,任何抗议活动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能长期占用公共场所,因为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占领行动代表说,这些帐篷们代表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是自由言论的具体象征。孰对孰错呢?女法官的裁决是:她将慎重考虑下帐篷们的命运,并在12月15日做出最后裁决。而在此之前,禁令依然有效。于是,我和Occupy成员们一样,大大舒了一口气,甚至津津有味地看着Occupy与警察在最后摊牌之前玩着紧张而刺激地老鼠玩猫的游戏,比如说警察不允许新设备进入广场,而占领者们就偏偏计划扎新帐篷;比如说警察在帐篷广场竖立了一个牌子警告占领者,如果在街道逆向游行或是未经允许游行、喧闹或是阻塞交通就会遭到逮捕,于是占领者们就邀请市长和其他官方人士到现场参加一个帐篷纪念活动。最后这场游戏以一个家伙把一个临时水槽扔在杜威广场被逮捕了而暂告段落。这个乱扔垃圾事件让官方得以大大抱怨占领者们不讲卫生乱扔垃圾。或许,这也能影响法官的裁决吧。因为仅仅一个星期后的12月7日,法官就做出裁决,废除了禁令,并否决了Occupy Boston另一项禁令的申请,“虽然他们确实可以行使自己权力表达他们的不满,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得特权,占领使用他们现在坐着的那片地方。”因为在

这位法官看来，占领行为是占领使用一个地方，从法律上说，这种占领行为不属于言论，因此不能免于刑事诉讼。

对于这一裁决，市长Menino当然鼓掌欢呼，并鼓励占领者主动带着帐篷撤退。于是，12月8日晚上10点，在市长下达午夜之前撤退的命令之后的几个小时后，杜威广场聚集了数百人，开始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舞会和狂欢。午夜一到，帐篷开

始逐渐撤退，最终以逮捕46人结束了那个狂欢之夜。第二天傍晚，待我闻讯赶去时，帐篷已经撤了一半，最后一次露天的民主大会正在举行，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轮流上台发表告别的演说，甚至有一个无家可归人的代表上台怀念这个美好的社区和美好的狂欢夜，而台下一大半是记者。又一个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来到广场，就再也看不见任何occupy的痕迹了，警察将整个广场围起来，里面只有绿化工人在松土施肥种植草坪（据报道，仅修复草坪就花费了4-6万美金），那时是12月10日，星期六早上九点，我站在街道对面，突然发现这些帐篷们的消失与出现一样，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快得让我有些怀疑它们是否存在过。后来看到不少文章对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运动定性为：这是一场无领袖无纲领的新型社会运动，并从经济、政治、科技乃至资金运作等各个方面分析其实质与意义。这让我更加怀疑那些帐篷们是否存在过。X，你知道吗？两个多月来，我只是发现民主自由这种大而无当的形容词原来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名词，可以是帐篷里臭气熏天的吃喝拉撒与衣食住行，仅此而已。此外，还有就是原来帐篷可以这么用。Q





中国式经济增长背后的代价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有目共睹，但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执，这些年来却是一刻未停。近来，“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之一阎学通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应该运用古代的“仁政”模式作为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引来热议。但同时，面对“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也不免开始反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对于中国自身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近邻印度的崛起，也构建了人们“龙象共舞”的想象。据印度联合工商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中印每年贸易额为630亿美元，四年内将增长到1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大相径庭，二者究竟有何不同，遵循了何种发展模式？对这些问题，数十年来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曼，从“增长的代价”角度为我们进行了另一解读。



居伊·索尔曼 (Guy Sorman)，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曾任法国总理顾问。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经济学不会撒谎》等。



几年前人们乐于谈到的经济增长现在似乎已经被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更迫切的话题代替了，这可以被视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想我在这次来中国的航班上就体会到了，由于北京大雾，我们的飞机被迫在乌鲁木齐降落等待了十几小时。我觉得，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这些年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并不在于经济的层面。对我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南韩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

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其实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

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经济模式，中国不太可能会走向今天的“复兴”和“强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政府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我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是我未曾见过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



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有很多，但印度实际上选择了“小政府”这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为什么？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政府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政府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政府支配，政府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政府，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但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政府”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当然，我无意于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我只能说，二者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但民主体制并没有彻底消除印度的腐败？

中国和印度的腐败并不相同。我将印度式的腐败称为“小规模腐败”，因为中央政府较弱的缘故，权力分散到地方，行贿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也就是说，你得向官员们塞很多装着钱的信封，但每个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样，中国的腐败情况也很糟糕，但中国的腐败更为集中，这



和政府的形态有关。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它也许得向上百个相关人行贿，而且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很难说。但在中国，如果有办法找到三四个“关键人物”，并对他们行贿，你会发现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公司更青睐中国而不是印度，虽然行贿的总成本或许大致相当，但是中国的腐败显然更有效率。这是两种腐败最明显的不同。

尽管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但依然有不少西方人在赞美中国的经济模式，这应该怎么理解？

确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人是赞美“中国模式”的，但这当中有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商人。他们甚至希望能在欧洲推广这种模式。这对他们的生意将更有利，因为这种模式更讲效率、主要人物更有决定权、任何计划都不用很长时间讨论、也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和麻烦的NGO监督。如果从纯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我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成本的低廉，而更是体现为一种商业效率。如果一个生意人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这里除了生意你几乎不用考虑别的问题。

学者当中也有一些人患上了这种政治上的怀乡病。自从18世纪以来，“开明专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潮，但我对此并不认同。与民主制度相比，开明专制或许在效

率上会更有优势，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不能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制或许没那么有效率，但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幸福感，我不得不说民主制会为此提供一个答案。回到刚刚我说的印度，那里有不少穷人，但并不是都过得很不幸福。民主体制提供了那里的人们选择的自由。选择何种生活，说出自己的心声，甚至是想要生几个孩子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个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说，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争执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是效率还是个人幸福。

我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樊纲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交流。他对我说，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延续现状而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中国至少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占总数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到那个时候，中国会拥有和现在的欧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农村工作。当然这个设想很美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口需要等待五十年时间才能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说农村人融入城市的情况其实并不理想。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从另一面看，这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忽视了对于农村地区和贫穷问题的关注。

关于经济数据。不少中国人都在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您如何看？

作为经济学者，我知道数据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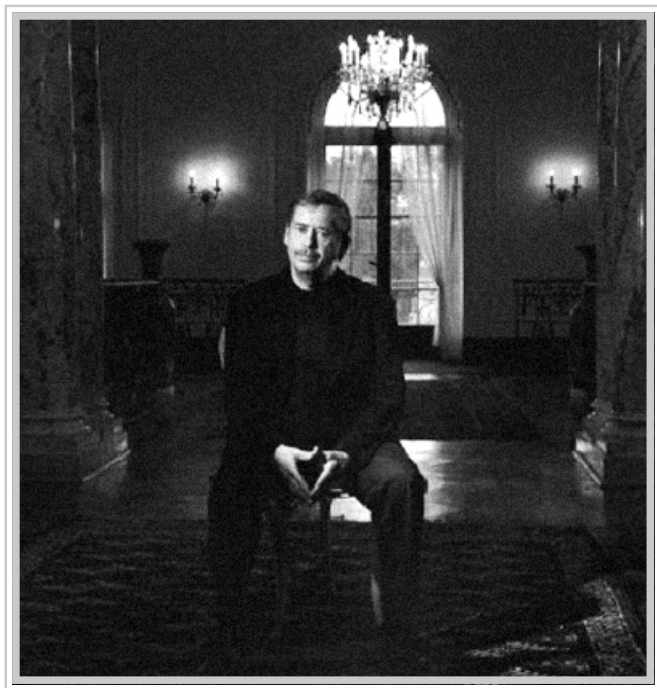
INTERVIEW

但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比如，“人均GDP100美元”这个数据，假设它分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那么其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选择亲往一些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经济生活之外的状态。再重复一遍，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其意义也不同。中国可能在理解贫穷的意义上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在美国，甚至是纽约，也存在很多穷人，但贫穷在那里的定义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买不起车就叫贫穷，而是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才叫贫穷。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的标准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拥有了另一种权利，一种得到别人救助的权利。

当然，我只是做一些很个人化的思考，并没有完整地研究中国问题的打算。但关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分享。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軾说过，其实政府发布的数据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包括通货膨胀数据也是这样。关于数据，茅是专家。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数据，另外一方面，人们会对经济的情况有自我的体会。比如当蔬菜涨价了20%而政府宣称涨价幅度只有3%的时，数据已没法掩盖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使得商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中国快速赚到一笔钱，随后可能会将资本撤离。人们都很聪明，因此不会有大型、长期的资本进入中国。Q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

特约撰稿人 崔卫平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离世，走完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1989年底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异议作家哈维尔被推举为新任总统，他不仅没有一份现成的履历，甚至没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他向别人借的那条有点太短。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在我们中间，有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我们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

“说真话，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而这一年的1月，他还被警察在布拉格文策尔广场

附近抓捕，事因纪念苏军入侵时自焚的青年扬·帕拉赫。他被判九个月的监禁。4月，一些演员、作家和知识分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哈维尔最终被释放。

为了向公众更好地介绍新总统，助手们认为，紧急印刷他的那本问答式自传是必须的，这本书的捷克文书名是《远距离采访》，英文书名译为《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1992年，中国的东方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将这本书翻译出版，印数1500册。

刚进总统府，哈维尔发现了许多有趣的

事情，比如自己办公室隔壁有一间屋子始终打不开。后来进去之后，他发现了一套通讯设备，是专门用来与华沙条约组织联系的。他与他的新同事顺使用这个设备，给戈尔巴乔夫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新年好”。

这期间，他应该正在准备那份著名的演讲——《1990年新年献词》。此文开门见山地说：“40年来，每逢今日，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要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个开场白很能够说明哈维尔的个人风格，也可以将它看做是他命运道路的起点：厌恶一切陈词滥调，尤其是其中的谎言。

哈维尔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有的家庭，这让他周围人们中间始终感到羞愧。他的父亲和叔叔创办了捷克巴兰道夫电影制片厂，该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基地之一，因此哈维尔多年的梦想是拍一部电影。年轻时他很想进布拉格最高电影学府，已成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推荐了他，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没有被录取。被排斥的经验让他学会“从下面”看问题，体谅别人的痛楚源于知晓自己的痛楚。

很少有人看懂他写的诗，他称它们为《图像集》。完整的词汇被他撕成一个个字母，像风中的鸟儿一样仓促迷乱。宽松的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在捷克先锋小剧场担任

布景、提词、照明和演员，有空也抓紧时间写作自己的剧本。他第一任妻子奥尔嘉是剧场的领座员。他的戏剧被认为是荒诞派风格，但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抽象，许多是嘲笑官僚主义的，弄一些暗语在剧场里与观众接头，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叫做《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在捷克作家协会上他大声发言，一度被认为是颇具培养前途的年轻剧作家，直至被开除出这个协会。

1968年苏军入侵时，他与朋友在捷克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抵抗了一个星期。始终处于边缘、生性腼腆的哈维尔每天撰写一篇评论，由当地的电台播出。他甚至还为不同部门政府的头头脑脑起草大篇宣言，表明捷克民族绝不屈服的决心。事后，他亲眼看见苏联坦克从市中心广场两边拱廊碾过，把一些人轧进瓦砾之中。抵抗的人们大多销声匿迹，许多人流亡国外，包括昆德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捷克社会一度变得死气沉沉。昆德拉写文章说被入侵是捷克民族古老命运使然，哈维尔对此言论予以反驳。

1975年，哈维尔提笔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绘了所处社会中人们精神和道德上的可怕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的“稳定”，是靠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来维持的。每个人都担心有东西会失去，因而接受来自官方的大小“贿赂”，在道德上把自己降为低人一等。那其实也是一段经济发展时期，然而人们仅仅拥有选择某部冰箱或洗衣机牌子的自由，拥有给自己房

屋内部装修的自由，当权者欢迎这种能量朝向私密空间的溢出。“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性方面的衰落，以及道德上的软弱无能？”他向他的总统发问。结尾处他对从未谋面的收信人这样说：“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做出估价，并以此而行动。”

写完这封信他长长喘了一口气，多年积压的精神负担稍微缓解。这是哈维尔性格上又一个令人瞩目之处：比起其他人，他更愿意坚持自己立场的一致性。当环境变了，周围的人们也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做法，他却愿意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回到最初的信念上去。他需要坚持自己生命的前后连贯。他把这个又称为“同一性”和“延绵性”。

信件寄出之后，他随身准备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肥皂、一点换洗衣服和常用药，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被捕。这之后的许多年中，如果他不是正好在牢里，就随身带着这个小包。1988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布拉格，在早餐会上会见了几位布拉格异见知识分子，哈维尔将这个小包也一并带上。他准备好一踏出家门就回不来了。

1976年，捷克一支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19位成员被捕，其中领头的叫伊万·伊劳斯。稍早时候两人见过面，长发披肩的音乐人并不信任哈维尔，认为他是“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哈维尔也逐渐了解到，这些人不管言谈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是音乐里有一种“特殊的纯洁，一种羞怯心，一种脆弱感”。乐手被抓的事件在布拉格知识界引起震撼，《七七宪章》因此而诞生。这份区区

几千字的短小宣言，旨在呼吁政府能够遵守自己同意的（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第一批签名者243人。宪章的三个发起人包括哈维尔本人、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以及1968年离职的前共产党人、当时的外交部长伊希·哈耶克。这个组合体现了参与者的多元化。

哈维尔是三个发起人当中最年轻的，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从此他开始了与警察之间的多年周旋。他当总统13年，而此前的十来年，都是在监狱或看守所大门进进出出度过的。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979年5月到1985年1月。这位未来的国家总统，在当时以“危害共和国”的名义被判刑四年半，最终因病提前半年释放。他在牢里被允许每星期给妻子写一封信，因为不准谈其他事务，他就继续发挥有关人的“同一性”“认同感”“存在的地平线”这些令人费解的题目，弄得他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什么‘存在的秩序’，‘精神的秩序’，你惟一应当关心的，是监狱的秩序。”

些书信后来以《致奥尔嘉》为名结集出版。在监狱这个世界的尽头，哈维尔再次返回自己的源头，检查自己生命的根基。他对妻子写道：“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许多人欣赏哈维尔反抗的行为及勇气，然而在我看来，与他看得见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他不断给出抗争的理由。他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不是因为仇恨而反抗，更不是为了赢得权力或名声，而是因为人的“良心”“尊严”和“责任感”。他被誉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国王”。

还应当算上“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穿透力，能够看清潜藏在事情背后的东西；也是一种坚持的决心——一旦看到，就深信它。他竟然把良心这种东西带进了政治！他反复强调，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生活为敌，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家们则应当对这个世界担负更多的责任。

他反对他的前任一再打压社会良知的做法，在转型最困难的时刻对公众呼吁：“我一次又一次相信，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的和困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善意，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和给它提供空间，赋予其希望。”

2009年3月，哈维尔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中国知识界一行三人。我们向他发问：

“什么是贯穿你一生的东西？”他答：“冒险性。”问到有关历史及其与个人的关系，他强调，“偶然性”更重要。问他想对中国年轻人说些什么，他回答，“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是的，假如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视自己的生命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四分五裂，就会进入充满偶然性的种种冒险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冒险都通向总统宝座。哈维尔的故事也并非一个成功的典型，他身上有许多自我抗击的成分。他的政治对手克劳斯批评他是个“半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任职期间，突然被传唤到某个阴森森的法



图为哈维尔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离开》剧照

庭接受审讯，或者直接被带去哪个采石场服苦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哦，处于转型期的身心疲惫的公众，听到他们的总统早晨向他们发布昨天晚上的噩梦，会怎么想呢？然而这却是哈维尔接近自己、保留自身人性

的独特方式。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运设下的残酷陷阱”。

2007年，他将自己从权力中撤出的经历写成剧本《离开》，2010年又亲自导演拍成了电影。他最早梦想终于实现。Q

千山我独行

特约撰稿人 熊景明



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窗外海天一色。打开邮箱，竟然有五封邮件带来同一噩耗：高华走了。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是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

的人要安静坚强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号去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对现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最佳解读。这部书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今年并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言：‘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这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辩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着其间的内在联系，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高华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为了不影响睡去的妻儿，坐在厨房里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小小一张台已足够，高华写作时，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的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正值茂年，虽早生华发，却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衣装搭配得体，总是笑脸迎人。几年前，他已经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肝癌病人平均寿命6个月。高华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所有医生惊讶赞叹。到最后的日子里，周围的医护人员都被他感动、感染，全力以赴将他从生命的边缘上一次次拉回来，似乎相信奇迹可以延续下去。

打电话时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讲到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有一阵，他的病似乎稳定了，准备到外地开会。祝贺他，答道：此病是不声不响的，鬼子进村静悄悄。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孙的部下很高兴，其实乃大崩溃的前兆，6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6次的时候，还是和高欣、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

汹……呵呵！’他从容面对，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新播的《新亮剑》和高欣、我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说起《看历史》杂志举办的评奖活动。他问我，去年是竹叶青酒赞助，今年他们找到哪里资助了。“我的天，高华，你怎么所有事都记得那么清楚！”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但怎能接受如此清醒的头脑将停止工作。

“小刘批评我疏懒了，我没有呵”，“当然，你一直勤奋”。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一万六千字的长文，“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且谈历史。“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新世纪》记者灵子就教于他，关于革命话语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

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后面的可悲的简单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地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当然，也因为出现一位集高层政治斗争计谋和底层地痞流氓的手法一身的关键人物。他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和高华聊天就像和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得活灵活现。2006年高华到中大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可贵之处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自尊，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顺便列举福建几个农民“战斗队”，指出，其实农民造反不成气候。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高华认为，如果只把握了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作为一位杰出的

历史学家，他对资料的把握，对历史运行的逻辑和因果的通达，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道，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100分坏来对待。对历史人物做出别具一格剖析，是高华的特长。听他畅谈，沉醉其中，可惜没有记下他无数妙言妙语。

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一身，相当于会写剧本也会演戏。高华在南大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开夜课，“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受到高老师魅力的感召，都有来南大串堂听高华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专程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的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围绕”在他身边的学生，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一个月之前他（另外一位学生）来电问我情况，声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国的惯例，圣诞一放

假，就从爱荷华转机洛杉矶飞回来了。见到他之前，心里面不由一阵难过，每年他回来，我们总是约好，一起从扬州和无锡去看高老师，大家聊天吃饭，多少快乐时光，仿佛一家人”。高华去世前一天：“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我已经订了晚8点回无锡的车票。只能依依惜别，高老师还是躺在床上向我们挥挥他的大手，提醒我们带好钱包钥匙等。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对人对事的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一位对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了解最深，梳理最精妙的学者，正当英年，没来得及将他的研究和见解完全留下来，就走了。高华

离去，令我们如此不舍，因为他带走太多，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高华做手术后，胡杰和我明白他来日无多，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首次访谈，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候选人常成就《红太阳是怎样升起》请教他。此事才开头就受到干扰，没有能系统地进行。万幸的是，高华在病床上，回答写作初衷中时，留下几段独白。今日读来，好像壮士从容就义前的临别赠言：

“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1991年的8.19事变，8.19事变的第一天。我家里还有个老式的收音机，我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一会儿苏联国歌，一会儿苏联爱国歌曲，一会紧急委员会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开始写红太阳第一章。而且，我感觉到我应该写！

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革命年代》里，我讲的是五零年代，我成长的这个长期，受到主流思想相当大的影响，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在审视它，在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它说再见。”

高华去世前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让学生扶他坐起来，问我道，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Q



天使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
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